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

吳世昌著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

三十七年六月初版 〇〇〇一——三〇〇〇

著　者　吳世昌
發行人　儲安平
發行所　觀察社
上海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基本定價：國幣十元

目錄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

思想復員論

一

抗戰八年，中國除了淪陷全世界被侵略國中面積最大的土地，死傷最多的軍民，損失最鉅的物資以外，另外還有一種精神的損害，却不大爲一般人所注意，然而其影響之大，後果之嚴重，足以妨害下一代的建國工作，乃至對于世界和平的貢獻。物質和生命的損失是看得見算得出的，正如一個人割了一隻手，炸了一條腿，創痛鉅深，人所共知；精神的損害則像神經失常，貌似健康，實同癱瘓，一切工作，都受阻害。現在復員工作之如此麻痺，內戰危機之如此迫切，雖卽謂之中國人民在八年抗戰中所受精神損害之自然結果，亦不爲過。而展望中國前途，照理講應該無限光明，事實上則滿目憂患。在日本投降之前我們者作此言，必且被目爲杞憂，但在今日，則卽使最樂觀的人，也不敢認爲這是聳聽的危言了。

戰後第一件事是復員，該復員者，從交通、金融、教育、軍事說起，頭緒紛繁，手忙脚亂；但很少有人談到思想復員。莫非抗戰八年，中國人的思想原封未動，或者今後建國，依然須要戰時思想（好不好對不對是另一問題），無需改變麽？

說到思想復員，當然包括大後方和收復區。收復區又包括台灣、東北，受敵僞奴役自五十年至六十年不等，在復員以前還要消毒，問題頗多，可以另成專論。然其最後復員，仍當以抗戰根據地的大後方爲藍本，爲標準。所以本文所論，仍以大後方的思想復員爲限。

復員不是復原，應該更進一步，更加積極。中國戰前的一切措施，在準備抵抗侵略，今後建國，範疇不同。目標既異，性質亦殊。若祇恢復到戰前狀態，不僅不夠，亦且不可。然在復員過程之中，也許還須經過戰前這一個階段。所以也不能不附帶說到戰前的情形。復員的目標，不能不顧及今後世界的大勢。一切工業、政治、經濟、軍事的建設無不如此，而戰後世界思想的潮流，則爲上列各項建設的指針，尤不可不注意。所以思想復員，是當前中國問題的核心。

二、

在這次大戰以前，全世界的思想分爲二大壁壘：民主與獨裁。民主國家崇自由，獨裁國家主統制，崇自由故尊重輿論，主統制要統一思想。尊重輿論，故顯得意見紛歧；統一思想，故容易事權集中。意見紛歧，則牽制亦多；事權集中，則功效易見。於是急功近利的短視病者，不免大驚小怪，認爲民主主義沒落了，代議制度失敗了，要富國強兵，非獨裁不可，非統一思想不可，非管制輿論不可，非這樣那樣，不足以禦侮圖強，……若論其動機，也許未嘗不由於愛國心切。但這種思想，有一個危險的傾向，也可說是必然的結論，即如果讓它發展下去，必然要役奴別人，同時也限制了自己的智識，終於毀滅了自己，與其所預期

的得到相反的效果。因爲自由是人類的崇高理想，不但現代人要自由，連原始人也何嘗不要自由？不但人，連動物也有，那一隻鳥願意被關在籠裏，那一條魚願意被蓄在缸裏？違反了現代人類最基本的要求，不管理論如何漂亮，事功如何見效，最後終必害人害己，自招滅亡。試想希特勒，慕索里尼和日本軍閥，如果不統制思想，容許人民自由批評其政策，牽制其行動，這次戰爭也許根本打不起來，又何至於使三個一等強國土崩瓦解，使全世界人類遭這樣大的災難？這些道理，說穿了平凡得近乎幼稚，而在當時則多少名流學者，甘於身受奴役，而且爲之宣傳效力，希望別人又受他們的奴役，而結果如此，豈非人類的大悲劇？自由思想又是文化進步的必要條件，尤其是現代科學的原動力。侵略國家因爲要迅赴事功，把自由思想者趕出國境，提倡實用科學，不注重理論科學，以爲只要飛機大炮，便可以統制全球。但是因這次戰爭而發明的原子彈，却是從原子能研究出來的。原子能理論起於相對論，而相對論發明者愛因斯坦却在戰前老早被希特勒趕到美國去了。以德國的科學基礎，如果發明了原子彈，可以兵不血刃而雄視全球。這又是統制思想者的另一教訓。

中國自五四以後，思想自由本來已經打了一個基礎。國民黨的改組，國民革命的成功，乃至抗戰之所以能造成輿論，推動政府，未嘗不是受五四以後思想自由，民智進步之賜，這是誰都得承認的。孫中山先生論到心理建設，也曾指出新文化運動的貢獻。而新文化運動中最大特色是英美傳統的自由思想，一切哲學、文藝、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主義理論，都被介紹到中國來。使頑固守舊者自慚寡陋，清末維新者自慚落伍。當時受教育的青年，都已成

爲這支持抗戰的主要幹部。定都南京以後，北平因爲不受政治影響，自由研究的風氣得充分發展，使中國學術界逐漸取得國際地位。而全國學生請願抗戰的風氣，也起自北平，因此而有一二八之役，奠定抗戰的軍事心理，測定抗戰的軍力比例。繼而有二十四年的一二九學生運動，使華北五省，平津二市的僞自治運動減至冀東二十二縣。但我們也不能不沉痛指出，北伐以後因爲內亂相尋，政府對于思想言論的統制逐漸加強。一方面則復古思想又抬頭而得勢。一個學者以新史學的眼光做了一部歷史教科書，竟被禁止發行。民初北京政府的教育部有胆量制定並公布的注音符號，過了近二十年，已經鑄成鋼模，反而被禁止應用了。若干省份的長官，自己連一封信都寫不通，也要提倡讀經，談古聖先賢的微言大義了。「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無補於富國強兵，早已經用甲午海軍來證明，用一個帝國的崩潰來證明，然而許多心存魏闕的名流學者，也居然談起「本位文化」來了。甚至於許多歐美留學生也不惜借此爲終南捷徑。這一切，本來可以引起思想界很大的波瀾。但因當時國難嚴重，大家無暇及此。七七以後，軍事高於一切，急於一切，因軍事外交而統制消息和言論，政府有理由，人民也承認。至於思想，則只要不違背抗戰國策，是不能也不必統制的，而復古之類，則根本阻礙進步，不僅與抗戰無關，而且大有妨害。可是有的人却利用抗戰的大帽子來壓迫思想，箝制思想，束縛思想，窒息思想，却大有害於下一代青年的精神健康。現在抗戰旣已完成，這頂大帽子自不能再被假借，思想的復員，是建設新中國的主要條件，一切復員的總關鍵。

三

如果說統制思想完全爲了抗戰的必要，那是沒有的事。英美也抗戰，何嘗有此必要與現象？恰恰相反，爭取思想自由是英美這次對德義作戰的主要目標和號召力。如果說統制思想與抗戰毫無關係，則也不盡然。在抗戰初期，確有人迷信法西斯義大利和納粹德國的辦法，可以謀急功近利，認爲統制思想也是必要的。但到後來，却完全變爲爭取派系利益的一種手段，並且不惜以威嚇利誘種種方法來補統制之不足。這都比較因迷信軸心國全盛時代的行政效率而東施效顰，其存心更不堪問了。有的人要統制思想，却由於無知，例如我們常在有些建築的牆壁上看到一條標語道：「紛歧錯雜的思想必須糾正」。只要略爲想一想這條標語的文理和內容兩俱不通，便可以原諒製造這標語者的幼稚了。所有這些，對於這一代的青年都發生了或多或少的不良影響。

統制新聞言論的對象是出版界，統制思想的對象是教育界——教育比較難統制，於是乎學生就倒了霉。統制必須有個機構，於是乎成立了訓導處，成立了導師制。當然，這些制度，表面上是說仿照英國牛津劍橋的 Tutor System，說起來眞漂亮，可是天曉得，牛津劍橋的 Tutor 會做中國學校中訓導長的工作！可是一針見血的是訓導長的資格限制：必須他本身是進過訓練團受過訓的。換句話說，必須他自己的思想先已被統制得四平八穩，决不紛歧錯雜。戰時學生來自陷區，受生活壓迫最烈，政府設貸金及公費制度，本來是好意，是善舉，但是審查貸金公費要看思想如何，還有其他種種見不得人面的條件（隨各校情形而不

同），清寒學生即使不願意，亦必違心承認，其苦痛甚於「嗟來」之食。否則不但讀書成問題，連生活都成問題。又以公費誘迫學生舍其所好而改習實用科學，還以爲是在獎掖人才，試問人間精神迫害之殘酷，更有甚於此者乎？試問妨害國家文化發展之前途，更有甚於此者乎？有人以爲：這種辦法，意在使青年心智集中於機械工作，免得談文藝，談思想，談社會科學——總而言之，免得談政治，搞政治，必不得已而欲談文藝，談思想，則也替你預備好了一套，卽所謂本位文化者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還不夠嗎？這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論的復活。這個解釋對不對是另一問題，姑且不說。但如果我的記憶沒有錯，則嬴政所不燒的種種醫藥等書，相當於現在所謂實用科學，而他所痛恨的諸子百家，則大概是什麼什麼主義之類。

至於教授的思想雖不大好統制，而其所受的精神迫害也並不太少。平日因受生活壓迫，設備限制，無法作研究工作，已是很大的痛苦；眼看着國家的危急，政治的不清明，而騰不出料理油鹽柴米的時間來考慮國家問題，卽使想到了，要說話，而其社會地位已爲豪華的國難官商所掩蔽，不像戰前那樣有效力了，而對於國事又看得比較明白，有骨鯁而不能吐，這是何等痛苦！並且據我們所確實知道的，有的教授學問極有地位，却被指爲有「思想」問題而解聘。而戰時各校校長之更動頻繁，又是另一種妨害學術文化的因素。最後，我們也並沒有忘記學校裏的派系傾軋，黨團侵入，對於教育界是怎樣大的一種罪孽，對於思想界是怎樣大的一種威脅。大學如此，中學更不必說。

當然，這種情形，在湘桂之役以後已見改革，以前也並非全國如此。大體說來，有歷史的學校，在渝、蓉、昆的學校，比較能保持正常傳統。至於在僻遠省份的學校，則其情形恐怕有甚於上文所述者。學生看魯迅的書，可以被指為危險分子，而佩「自衛」手槍出入者，可以雄視全校，睥睨一切。至其思想之枯窘麻痺，則令人幾難置信。許多學生作起文來，只能搬弄「黨員守則」即「青年守則」的文字，因為其在中學時代所受「訓練」，說話越此範圍即被目為思想欠「純正」。

若要列舉抗戰以來教育界所有這類，眞是更僕難數。我們指出這些事實，也知有的前已糾正，有的已因抗戰結束而撤消（如新聞檢查），並不是要算舊帳，也不是什麼「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之類，却是因為思想一經束縛，恢復非朝夕可致；而且今日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其受制在若干年前，當時尚未成年，當談不到思想，而一經先入為主，以後恢復尤不容易，而今後三十年建國的重荷，却正落在這一代的肩上。這是一個何等嚴重的問題！

離開學校，來看社會，這幾年的抗戰，在一般人思想上烙印打得最深的，我覺得是一個「訓」字。中國據說以儒教立國，但我不記得六經上究有多少「訓」字，其意義是否和現在一樣。而現在則受訓、訓練、教訓、訓示、訓話、（不錯，還有精神訓話。因為某校學生曾有警語曰：不怕飛機轟炸，只怕精神訓話。所以令人特別記得。）一碰就是「訓」。在以前，「不足為訓」四個字是連在一起的，而司馬遷所謂「言不雅馴」之馴則是馬字旁，與此無關。最近的聯想，只有滿清時代小城市裏的地保有時奉命要講「聖諭廣訓」，講完了說一個

故事散場。這個訓字的傳播，我想中央社最有功勞，因爲並世任何國家長官講演是講演，而在中國則即使是校長科長，一旦講演而記成新聞，必定變成訓話。外國人的教練（Couch），練習或鍛鍊（Train），學習（Learn），一翻成中文，也就一律變爲「訓」練，受「訓」之類。甚至於外國職員見高級職員，明明他們自稱爲訪（Call, Visit），也一定要譯成「謁」。只有一個「奉諭」的諭字，還沒有送給洋人。嗚呼，側媚之風，至今極矣！中國的精神文明已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誰謂人心不古，吾道其衰乎！然而據說所謂民主國家也者，官吏是人民的公僕。豈有公僕向主人報告其職務有關的事情，應該稱爲訓話的？二千年前的「人之患」據孟子說是「在好爲人師」；今日之患，將非在好訓人乎！

四

在抗戰期間，政府爲軍事、外交機密而統制新聞和言論，自有其必要；甚至統制思想，人民也都原諒容忍了。現在戰事既經結束，自應開放言路，培養自由思想。中國如今已經掛上了國際民主列車，不論她能否或願否民主；不但掛上，而且要時時刻刻提防脫節。否則便不能建國。這個道理既微妙，亦簡單；可以說，但也無須說。現在談思想復員，而思想在各人腦中，我要解放，誰也不能制止，不必也不能請人代拆代行。復員不是復原，當然更不是復古。中國要建成一個自由國家，國乃人之積，非自由的人民，如何能變成自由國家？中國要建成現代國家，沒有自由思想，如何能研究科學，發展文化，變成現代國家？中國要建成民主國家，人民自己如果不願作主，懶得作主，甘居下賤，國家如何會變成民主？思想復員

不必登記，也無黑市，思想必須迅速復員，因爲中國已經掛上了現代國際的自由民主列車，萬一復員不夠迅速，列車脫了節，弄得不好，出了軌，那才要倒五千年精神文明之大霉！

中國青年運動的週期

一

中國的青年運動，可說自有史以來，卽迭相起伏。夏殷二代，民智初啓，文獻不足，比較詳細的記載，起自春秋；而春秋的作者孔子，仕進則握輿論的權威，退休則招集青年，做種種啓發文化，批評政治的工作。這個「不知老之將至」的青年，雖無土地而有羣衆，其影響歷數百年不衰，至漢高祖之再度統一，而鄒魯之士猶凜然不可侵犯，後人遂尊他爲「素王」。「素王」者，用現代的話來說，是羣衆運動的領袖，在野黨的黨魁，他對於當時的政治人物，少所許可，連對管仲也毀譽參半，惟獨對子產最爲佩服，因爲子產最尊重輿論，最愛老百姓。由於他的建立民主的政治批評，遂有戰國末年的「處士橫議」。當時好戰的諸侯當然討厭這些「橫議」，但就整個的民族文化而論，這些橫議無疑的是有貢獻的。而那班「處士」——換句話說，尙未執政的學生，也畢竟因爲有青年的求進步的熱忱，所以才有「橫議」。孟子是孔子的私淑弟子，所以他也比較有民主的思想。

二

以中國的整個歷史看來，大概國勢強盛，政治清明的時代，人民安富尊榮，自然不會發生什麼運動。卽使有，也只限於純粹學術方面，與政治大抵無關。所以漢唐盛時，至多只能

產生賈誼的痛哭太息，裴樞的高標清流，而鼓不起運動來。戰國以後，歷史上最大的青年運動發生過兩次：一次是東漢末年黨錮事件，一次是北宋末年的大學生運動。前者的領袖李膺郭泰等想把政府從宦官的腐化和專橫中救出來，後者的領袖陳東等在外寇壓境的危急時期力排和議，要求政府能奸相蔡京而任在野的主戰派李綱。由於桓帝靈帝的昏聵，郭泰等在政治上失敗了，他的黨徒杜密等進了宦官的集中營受非刑拷打，范滂等被切下腦殼，後來索性把成千的青年學生推入水中，說把這些自稱「清流」的人物扔到濁流中去罷——因為當時還沒有發明「自行失足落水」的妙語。但是腐化的宦官，也終於爛完了四百年的「漢業」。徽欽二宗比較有點智識，採納了陳東的建議，雖然仍不免靖康之難，但却振起有宋開國以來的文弱之風 建立抗戰的精神，支持了南宋的半壁河山。高宗因為自己想在杭州苟安一時，不聽宗澤建都南京的建議，又把陳東殺了，但後來他良心發現，後悔不迭，又給陳東封墓贈官故如以這班青年運動領袖的個人而論，或不免一死，但中華民族的氣節和忠義的基礎，却是他們奠定的。使後之執政者對於無權無勇的書生的言語，不能不有所顧忌而時時警惕，也是他們的功勞。

此外如東晉的羌胡南侵，按理說也該有青年運動。但因為東漢末年那次的大屠殺，把青年人殺怕了。在思想方面，佛教的消極主義和老莊的無政府思想又合流起來，使智識分子多傾向於逃避現實，而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政權操諸少數貴族閥閱，平民毫無發言機會。豈但平民，連智識分子都毫無辦法，所謂「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少數人把持政權，是走

向亡國的特效藥。所以南朝此起彼仆，政府如同傳舍，北朝的中原舊族，竟至教其子弟受學鮮卑語，習彈琵琶的漢奸訓練而不以爲恥。東漢阻害青年運動的流毒，竟至於此！

明代因爲已經有了陳東的大學生干政運動作基礎，智識分子見到政治腐敗，就比較的不甘緘口了。明末的東林復社，頗有東都餘風：讀書不忘救國。但是魏忠賢的集中營——東廠，比起東漢的監獄來還要殘酷毒辣，國家亡了一半，馬士英還要努力打內戰，勾結奸閹餘黨阮大鋮來捕殺青年學生，以圖鞏固其政權。當時稍有氣節的智識分子，給前魏後阮殺逐殆禁，弄得一乾二淨。結果，自然只好讓崇禎太息「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只好把「不愛江山愛美人」的福王送給敵寇，刺出血來做「福酒」喝！

三

本文所討論的青年運動的週期，只限於近代。上文不過略舉史實，作爲借鏡，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近代的青年運動，大都是由外患逼出來的。最早的戊戌政變，便是一個例子。在滿清的積弱之下，光緒雖想勵精圖治，但是舊勢力太深固了，幾個書生敵不過母后那拉氏的黨羽爪牙，徒然犧牲了一批青年，禁錮了一個天子，招致了後來八國聯軍之入京。於是革命黨人才知道改良主義之無補於大局，始有民國的肇建！所以辛亥革命，也可以說是以孫中山先生爲領袖的民族青年運動。而壓迫青年運動者之終必覆亡，又得了一個血淋淋的教訓。

辛亥革命成功得太快了，出乎意料之外地早熟。那是由於袁世凱自私的詭計，所以他便

算從滿清承襲來的尸居餘氣，把革命青年壓迫到西南一隅，盜移國柄。他雖然終於倒了，但是承繼他這系統的北洋軍閥，無他的雄才而有他的腐化，使中國即使以歐戰戰勝國的地位而獨不能取得國際的平等待遇，於是乎實際上在簽定二十一條，接洽西原借款時就醞釀着的民氣運動，便借歐戰結束的時機爆發起來，這就是所謂「五四運動」。結果是中國在巴黎和會的代表拒絕簽字，山東問題懸而未決，遂有後來的華盛頓會議，九國公約。日本之懷恨美國，也懷胎於此。這個運動以外交的，政治的開端，擴展到文化的，思想的，文藝的，支流頗多而力量也隨之分散。到了後來，幾乎完全喪失了他的外交性與政治性，純粹向學術文化方面發展，——這方面的貢獻之大，史無前例，但是注意實際政治的人，漸漸的減少了對它的興趣，而它也不再有政治作用。遂使軍閥政治的腐化，外交形勢的惡劣，日益加深。於是埋頭於政治工作的青年，發動了五卅運動。

五卅運動的文化意義不如五四，而其政治的、經濟的價值則遠過之。此在參與五四運動的前輩，或許不肯承認。但事實是如此：從事五四運動的人，只覺得中國自己太不爭氣，西洋文化之可欽慕，要努力摹倣，移殖，吸收；而對於當時西洋文化的保有者所加於中國的剝削和壓迫，則很少注意。這種「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的態度，這種虛心求進步的態度，固然極可佩服，却不免忽略了對外爭取解放的努力。只有孫中山先生，常常提醒國人：中國是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指出了當時中國和列強之間的經濟關係。他的青年信徒，鑒於文化工作之不能打倒受各帝國主義勢力操縱着的軍閥，於是到黃浦去武裝起來了，大多數仍舊處在軍

悶壓迫下的青年，便發動了五卅運動。這運動不僅喚起了民衆更深刻的覺悟，並且第一次指出青年運動對於帝國主義經濟壓迫的影響，因此震撼了環伺中國，經常在吸中國人血的列強。其中最不放心而積極想滅亡中國的，便是日本。

四

這以後，可能的青年運動被準備着的國民革命吸收去了。三一八事件是一個黯然的結束。在外交方面，歐美各國已逐漸正視中國民族主義的勃起，承認中國民衆的力量。同時也因爲第一次大戰後各國競爭軍備，經濟恐慌和失業問題忙得喘不過氣來，無暇東顧。日本便在民國二十年長江流域大水災的秋季，偷襲東北。於是學生請願抗戰的巨浪，捲遍全國。平情而論，在當時的情勢之下，要抵抗一個高度現代化的日本是很難想像的，但這運動却產生一種教育的力量，不僅使政府知道「國人可用」，鼓勵她積極準備，並且孕育了十四年來反侵略的士氣與民氣。連當時居心投降的汪精衛，也不敢不說：一面交涉，一面「抵抗」。

塘沽協定以後，華北形勢逐漸危殆。二十四年的冬季，日本揑造了「華北自治」的口實，壓迫地方政府脫離中央，激怒了平津的智識界，青年學生尤其憤慨，遂有「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大示威。這次示威，北平報紙雖然被檢查得成爲沒字碑，而東京朝日新聞上的「支那學生大陳列」，却成爲頭號標題。結果是華北五省，平津二市的「獨立」計劃沒有成功，華北五省在日本的垂涎之下，青年的憤怒之下，又保持了一年半。到七七事變，全國青年的

力量，都被吸收在抗戰建國的大事業中。

在這八年的抗戰期中，軍事高於一切，自然不會有什麼青年運動，雖然三十一年春季昆明有過一次對內政的運動，但比起上述各次來，畢竟要不重要得多。日本投降以後，大家給勝利陶醉得莫明其妙，雖然有一大片領土脫離我們而獨立，並且其獨立並非由於當地人民直接要求，而由於和另一國家的談判，却意外地平靜。可是勝利的糖衣舐完以後，內戰的苦果立刻痛楚了全國人民的心臟。看情形，正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完結時一樣，中國又將以戰勝國地位而墮入自相殘殺的大混亂中，喪失已得的國際地位。並且第一次我們雖也參戰，却並未受到戰爭的損害，這次是在歷史上曠古絕今，在聯合國中最久最大的犧牲者，如果再不自愛，這一代的人將成千古的罪人。於是在三十年前的討袁之役的根基地，一大羣流浪青年發出全國人民下意識中期待已久的怒吼。不幸的是像反對內戰這樣天經地義的一句話，還要用孩子們的鮮血來寫出，用智識分子的生命來傳出，實在太可痛了。內戰終於停止，死者可以瞑目，而內政外交種種問題，還是十分嚴重，於是上海和重慶的青年，一再發起運動，督促政府在內政和外交方面的努力。

五

我們綜觀近五十年來的國勢，一年危急一年，至七七事變而到生死關頭。青年運動的週期，也一次迫近一次，假使我們把近五十年的中國青年運動列成一個時間表來看，是很有趣味的：

一、戊戌政變（一八九八）——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十三年
二、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一九一九）八年
三、五四運動——五卅運動（一九二五）六年
四、五卅運動——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六年
五、九一八事變——一二九運動（一九三五）四年
六、一二九運動——七七事變（一九三七）二年
七、抗戰開始——一二一運動（一九四五）八年

從這張表看來，青年運動的時間距離，逐漸短縮。表上第三第四兩個階段相同，這中間還夾着一個小小的三一八。只有第七一個階段時距較長，因爲對外戰爭期中究不該有什麼運動，而其實中間（一九四二）還夾着一個昆明學生倒孔運動。所以大體說來，各階段間時距的日趨短促，正與國勢的危急成正比例。而且相當平均，成爲加速度的上升。

本文只想對於中國近年的青年運動作一個客觀的歷史說明，並不願加以任何恭維或誇大。不過遠稽漢宋，近察國勢，事實告訴我們，每當外患相煎，內政欠修的時代，青年運動必然起來，而執政者對之是否壓迫，往往與其本身的是否腐化和智識水準爲斷，如果壓迫而居然成功，則這個壓迫最後亦必倒下去。這些事實，如影隨形，如響斯應，歷歷可數，毫髮不爽。對於青年運動如能善爲利導，則可以挽救危局，發揚文化。每當政治修明，國勢隆盛之際，當然不會有青年運動，所以青年運動可以說是不幸而產生的，因爲它的產生證明了外

交或政治上的重大缺點，所以往往招執政者之忌。但到應該產生而不產生或被阻遏下去，則無寧是國家更大的不幸——因爲不產生表示民氣的銷沉，國魂的麻木；被阻遏下去是對於新生機的摧殘。古人說：「天聽自我民聽」。最正當的辦法是要善於利導，使他發揮成革命的建國力量，並且針對其所以產生的原因而加以改革。決不可使它橫決，成爲互相牽制，而抵消國力。

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

民主國家這個名詞，近來喊得十分響亮，中國人民要求民主的呼聲，也隨大戰結束而更加迫切。現在的所謂民主國家，一般指英、美、蘇、法幾個聯合國中的大國。中國也算五強之一，也被人指爲民主國家，實則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嘗過民主的味道，現在尙在夢想顚倒、涕泣以求的過程之中。至於中國要求現代化的民主，遠在五四時代。五四運動的目標有二：一爲學術的，要求科學化；一爲政治的，要求民主化。當然，科學化與民主化這二個名詞，在五四以後很久才被提出來的。當時的學者，只提出科學與民主兩大目標，梁任公所謂賽先生(Science)與德先生(Demccracy)。說來慚愧，五四運動是二十七年前發生的，那時中國早已是中華「民」國。「民」國是中山先生手創的，而創造了八年，中國人中才有少數智識份子發現這個國家並不民主，才要提倡德謨克拉西。而提倡是提倡，事實是事實，直到民國十七年，中國一直是中華「黨」國。一軍一黨，平分了二十年的天下。中山先生革命了四十年，發覺他所手創的國家，完全不合他本來的理想。十三年改組國民黨，重行北伐，分訂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訓政時期應該有多久，他並沒有明文規定。但他遺囑中要求國民會議尤須於最短期間內召集，而國民會議以後應該開始憲政，則訓政時期在中山先生的理想中，決不會太長。但是今日之國民黨，一經訓政，便欲罷不能。英國歷史家威爾斯（H. G.

Wells)批評英國政治說，「英國人本來沒有別人想像那樣壞，但吞下了印度，便弄壞了胃口。」一般中國人對國民黨也有此感，只要把「吞下了印度」改成「嘗到了訓政的味道」

但是，國民黨的「訓政」，名詞雖然與慈禧太后所用『垂簾「訓政」』的「訓政」相同，卻不是國粹，而是舶來品。俄國的大革命，雖比中國推翻滿清要遲幾年，但因爲從馬列主義之中發明了一黨專政這件法寶，衝破古往今來一切專制或民主政體的樊籠，才能肅清帝俄政治上的餘毒，建立一個嶄新的國家。國民黨推翻滿清之後，因爲未能肅清舊時代留下來的餘毒，革命勢力逐漸被壓迫到南方一隅，復辟、帝制等餘孽，反能興風作浪，北洋軍閥依然割據混戰，弄成民初中華「軍」國的局面。北伐以後的一黨專政，以及其他許多政制，都是模仿蘇聯的。這是誰都知道的事實，不必諱言，也不必舉現在的政制作爲證例。所不同者，蘇聯的農工專政，並未規定期限，說專到何時或某階段以後爲止。國民黨則規定訓政以後即爲憲政，訓政是過程而非終極目的。雖然訓政太久，甜頭太多，也會忘其所以的變成目的。由此，可知國民黨本意並不如共產黨之想永久專政。至於國民黨理想中的憲政，雖不一定如英美之憲政，也並不如蘇聯的農工專政。國民黨理想中的憲政，本來是民主的。

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現在大家都認爲她是民主國家之一。其實這個觀念是最近才有的。而且在一般英美派民主人士——即共產主義者所謂布爾喬亞——心目中，也依然有問題，在爭論。不過以前爲了對德作戰，現在爲了聯合國的前途，大家姑且承認她是民主國家。在蘇聯初建國時，全世界各國都目之爲洪水猛獸，有的甚至不惜派軍隊去包圍她，阻礙

弛，倒是中山先生卻老早就承認列寧理想的偉大，政策之正確，寄以深厚的同情與希望；而蘇聯之所以報中國者亦不薄，首先自動廢止不平等條約退還庚子賠款等等。直到蘇德宣戰以前，英美系統的國家，無不對蘇聯深懷疑懼。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英美之敷衍意大利，扶植德國，都有暗中拒抗蘇聯的作用。但彼時蘇聯埋頭建設，决無侵略他國之野心。只有共產主義的傳播是很快的。英美對蘇聯的疑懼拒抗，無它，只不過因爲蘇聯是農工專政國家，不是民主政治的國家。

但在納粹德國與法西斯義大利的侵略面目完全暴露以後，英法開始覺得蘇聯友誼之可貴了。而疑懼的心理則仍未盡除。直到一九四〇年德國向蘇宣戰，邱吉爾立即宣布英國將與蘇聯併肩作戰，英美兩國均以軍火供給蘇聯。世人公認這一戰是民主國家與軸心國家作戰。由於德義之太不民主，大家才承認蘇聯雖然也是一黨專政，畢竟是與民主國家站在一條陣線上的，這樣，在全部作戰過程中，蘇聯一直被世人公認爲民主國家。

在去年舊金山聯合國會議時，德國剛投降，換句話說，在歐洲英　美、蘇、法共同戰勝的戰爭剛結束。在舊金山會議中有許多問題，例如波蘭政府問題，牽涉到民主化的概念，英　美與蘇聯的代表就爭執起來，有人感覺到國際間缺少一本解釋正確的字典，因爲民主這一個名詞，在各國代表之間歧義太多了。這當然是笑話，因爲各國代表各依其本國的政治觀念來解釋，沒有一個代表會自己承認其本國政治是不民主的。因此，也可見得戰後民主的趨勢，各國代表均以不民主爲可恥。只有中國的官僚，可以厚着臉皮說：「什麼民主不民主，

根本不理那一套！」

但是，蘇聯究竟民主不民主呢？我沒有去過蘇聯，不能舉實例作證。許多到過蘇聯的人，紛紛舉實例來證明蘇聯人民如何豐衣足食，物價低廉，政治修明，科學發達，文藝優美，看來這些都是事實。但是政治是否民主，却似乎很少人提到，彷彿有意迴避這個問題，或者要到蘇聯而找不到這個問題的核心，也許在了解這個問題之先，我們還得先把什麼叫作民主這個定義弄弄楚清。

民主的定義，在英美國家，已經很清楚。英美民主政治的方式，中國人也大都耳熟能詳。但是不幸得很，也許是由於我的寡陋，竟沒有見到蘇聯所謂民主的清楚的定義，或蘇聯所謂民主異於英美所謂民主者何在。若照英美的定義，則人民可以自由批評政府的政策及施政情形；人民可以用暴力以外的方法，改換政府；凡是公民，都可以用自由結合的方式，組織政黨，用競爭選舉的方式參加政府。這幾點，即使是中國的共產黨員，大概也不能不承認是民主的條件。但是蘇聯是不是這樣的呢？

模仿蘇聯的國家，更正確點說，模仿一黨專政的國家，本來還有以前的納粹德國與法西斯意大利和日本，這些國家，都發展成為獨裁國家，終於因侵略而招致滅亡。蘇聯當然和軸心國家不同，其不同之點，照同情蘇聯的英國政治理論家拉斯基的說法，「共產主義如果沒有了理想，就會變成法西斯主義」。這個理想，據我看，大概即所謂經濟民主。

在許多到過蘇聯的中國人，回來很少談到蘇聯的政治民主等問題。只有郭沫若在訪蘇以

後，曾經說過這樣的話：許多人認爲蘇聯人民沒英美式的政治民主，這也許是對的；但是蘇聯人民有經濟民主，人人豐衣足食，決沒有英美資本家擁資百萬而失業者得不到麵包的現象。（大意如此，見去年新華日報副刊）。好了，現在問題似乎有了着落：英美有政治民主而無或缺少經濟民主。蘇聯有經濟民主而無或缺少政治民主。這個說法，大致不會偏袒一方。再說得粗淺一點，英美人民有充分的權，而利則不足；蘇聯人民有充分的利，而權則不足。

政治是管理衆人的事，這個「衆人」，當然也包括自己在內。人民要求政治民主，卽要求管自己乃至衆人之事。要求管自己，或同意別人（不是別人以暴力挾制）管自己的事，是不願意做奴隸。要求管衆人或同意別人管衆人的事，是相信自己或別人有能力管得好，這也不是強迫衆人做奴隸。所以政治本身，自有其必然的民主性，自己豐衣足食而無權管自己的事，却大有問題了。豐衣足食是好的，但也有闊人的奴隸，照樣豐衣足食，還能享受科學設備，聽戲看畫等等。但問題就在聽人指揮，不能管自己乃至衆人的事。孔子論孝，曾有一個很妙的譬喩，他說：

「今之孝者，是爲能養。至於犬馬，皆有能養。不敬，何以別乎？」

他說，當時的人以爲只要能使父母豐衣足食，便盡了孝道。闊人家的犬馬不是也能吃得飽飽，身披文繡嗎？問題就在敬不敬。莊子論自由，他用一個烏龜來作譬喩，認爲做梁國的宰臣，猶如被文繡以入太廟的龜，一個自由人却是曳尾塗中之龜，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似乎不只是被人養得胖胖的就可以滿足；自由意志，不受暴力壓制而能自由發展的意志似乎比

豐衣足食更可貴些。「一簞食，一瓢飲，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路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弗受。」人總是人，除了動物性的機能與要求以外，畢竟還多了一些自由之類的東西。當然，我們也承認，自由之類是可以用教育方式來改變的。正如同動物都有眼睛，而無光的水底也有盲目之魚。反過來說，如果根本不能得到衣食，瀕於餓死的境地，像目前中國的災民一般，當然也談不到民主自由之類。但從政治的觀點而論，也許正惟衣食不足，所以更有民主自由的必要。但如果說，只要衣食豐足，即使政治民主不充分也不在乎，人類的腦筋似乎並不如此簡單。

中國人民目前正渴求民主。大體說來，中年或中年以上的人所要求的是英美式的民主，青年人則多希望蘇聯式的民主。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界線，也許應該說，偏於保守者希望英美式的民主，思想前進者希望蘇聯式的民主，但如果說，青年或前進者只要豐衣足食，中年或保守者只要自由參政，則二者恐皆不肯承認。足見不論青年或中年，前進或保守，都有他們的理想。而今日中國的政治，所謂民主也者，還在各階層人民爭取之中，設計之中。中國不幸，枉有三十五年「民」國之號，而到今日，人民對於民主的消息，還在晨占鵲喜，夕卜燈花；民主的圖樣，還在畫虎類犬，刻鵠似鶩。但世界是在進步，不民主的局面，終於要破消滅的，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也並非是魚與熊掌，不可得兼。別人家的短處，我們並沒有必須抄襲的義務。中國人需要豐衣足食是天經地義，而自由則更可貴。我們現在只有根深蒂固的不民主，卻還沒有根深蒂固的政治民主或經濟民主。二者可以得兼，必須為兼。

中國需要重建權威

一　權威不是實力

中國人常說：「國於天地，必有以立」。以前只是一句抽象的理論，現在卻眞的從天上到地下必須找一個立足點，在這個科學猛進的地球上才能站得住。不過科學只是一種工具，誰有實力，誰便能用它。用的人或者把它增進一國的福利，或者自招滅亡，與科學無關，只在乎人。依照「誰有實力誰便能用它」來說，有實力者似乎即有權威。但事實上並不如此。第一，工具不是權威，所以科學本身不是權威。第二，實力本身及其應用者不是權威。這又可分兩層來說。第一層是實力可以推翻旣存的權威，但權威不必是實力。如某權威要靠實力來維持，——不論是原始時代的石斧石箭或今日的原子彈，這件事實的本身即證明這個權威還沒有建立起來，所以要乞靈於本身以外的工具。第二層是有實力者，具體點說，有政權者，未必能應用工具。中國過去的歷史都證明這兩點。淸末也有甲午海軍，旣不能應用，也就不足以借此挽救已經失去的權威。民初的軍閥，每一個都有或多或少的實力，但從沒有人會承認他們中任何一個是權威。

上文可以說是「權威不是什麼」，現在要說什麼是權威。本來所謂「國於天地，必有以立」，這個「有」原也不指武器，而是指某一社會中人羣所同意信守的生活方式和原則——

幾顆思想上的大柱子，頂住了這個社會（或國家）的組織機構。一般人稱這個機構爲社會制度或政治制度。這幾顆大柱子有時候叫作三綱五常，有的時候叫作四維八德，有的地方叫作民治思想，有的地方叫作共產主義。不管叫它什麼，重要的是在這社會中的人羣必須能同意支持這些柱子，這些原則，否則整個機構垮下來必釀成極大的災害。尤其重要的是要同意支持，不是強迫支持。所以權威本身，定義地 (by definition) 是民主的，不是獨裁的或威脅的。權威本身是抽象的，它不能與人脫節。一離開了人，便是海市蜃樓，毫無作用，不成其爲權威了。

有實力者有時可以拖倒這些大柱子，但如果沒有再建的本領，便是有力者及其社會同歸滅亡。彌爾敦詩中的大力神 Samson Agonist 曾經挾倒過兩個柱子，現代的珊姆孫是希特勒，他想一隻手拖倒民主政治一隻手拖倒共產主義這兩大柱子，結果拖倒了他的祖國。

中國人其實很早就能分別實力與權威的不同。秦始皇雖然滅了六國，可是並沒有建立權威，當然他的實力也不能穩固持久。即使是不讀書的老粗項羽，他在打倒秦帝國的過程中，也知道要立一個民間懷念的楚懷王的孫子爲義帝，作爲支持他實力的權威。後來他自以爲有了權威，殺了義帝，劉邦才有所藉口，從此項羽便走下坡路，從此劉家學了乖，天下未定即尊鄒魯的儒生，孝武帝更大倡儒教，要拿孔子的大權威來壓倒諸子的小權威。從此以後，中國的權威一直是儒教。雖然其中曾滲雜了別的思想，但都託庇在儒教的大纛之下。直到曾國藩，他還用以打倒想利用基督教來建立新權威而未成的洪秀全。太平天國是武力成功而思想

失敗，因此最後武力也不能不失敗。在他政治機構尚未建好以前，一開始就想打倒思想上的大柱子，結果連那面光芒萬丈的民族主義的大旗也無所附麗。近人常罵曾國藩是漢奸，殊不知他在一本正經的效忠於儒教這權威，而且成功了。至於滿清，在太平天國以後他的權威只是更沒落。

二　傳權威的被挑戰

向中國過去的權威——儒教——挑戰的，不是洪秀全，因爲他只是一筆抹殺，他只向滿清挑戰，他到死也不知道其所以失敗的思想上的原因；也還不是船堅炮利，因爲那些在正統的儒教徒看來只是奇技淫巧，開通一點的也只認爲可以楚材晉用。直到郭嵩燾、嚴復諸人說西洋也有二千多年的文明，這才使有心人暗暗吃驚。

不過自從西洋人用砲艦送進了新傳的聖經和商品以後，直到五四運動，越過了辛亥革命，大多數中國人始終沒有智識或勇氣承認傳權威已經沒落，必須接受西洋科學文明的挑戰，吸收現代文明的原則，刻不容緩的來建立一個新的權威。直到抗戰前一二年，還有人閉着眼睛在喊「本位文化」！他們根本不知道現代的英、美、蘇、法諸國，沒有一國的文化和思想淵源是純粹本位的，他們甚至於不知道中國文化最光輝的時期——戰國，沒有一國的文化和思想淵源不受別國乃至夷狄的影響和融合。你們聽見過有「英本位文化」、「美本位文化」或「齊本位文化」、「趙本位文化」沒有？

由於中國在巴黎和會之失敗而引起的五四運動，雖然接受了西洋科學文明，打倒儒教的

舊權威，但似乎並未有意識的建立起新的權威來。同時因爲要打倒舊權威，除了科學文明以外，又來了一個幫手，也可說是對儒教更可怕的一個挑戰者，那是共產主義，剛剛駭夠了歐洲人，又來駭中國人了。打倒舊權威時人手多，固然可以快些成功，但如果要建立新權威，人手太多是反而不便的。因爲要建立新權威，必須有個思想的重心。思想不能遺世獨立，要有人主持，更要有人支持。五四運動時大家抬出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賽先生（Science，科學）來當臺柱，但彼時的共產主義者却說，德先生是英美的玩意兒，落伍了，應該抬出馬先生和列先生來。思想沒有重心，主持者和支持者都分散了，權威是無法建立的。而且，彼時大家只忙於從舊束縛中解放出來，忙於介紹新的東西進來，似乎沒有考慮到要重新建立權威。

三　發現權威的重要及重建者

在民國建立以前，西洋科學文明雖已排山倒海而來，但除了極少數人以外，大家並未想到其後果會改變整個的社會組織和思想系統，自然更不想到要摧毀舊的生活方式和原則，而另建一個新的權威。康梁主張改變政體，保留國體，張之洞之流主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都足以說明他們只是遷就現實的改良主義者，從曾國藩所保留存下來的舊權威，他們是要繼續支持的。康有爲的大同書和譚嗣同的仁學，都準備藏諸名山，傳諸後代，不敢拿出來濟世的。事實上舊的權威在腐敗的清政和西洋的砲艦夾攻之下，早已成爲空心的老樹，而他們顯然尚未考慮到要建立一個新的權威。他們都是從舊權威中生長出來的人，舊權威之枯萎使他

們覺得有點異樣，然也許並不覺得權威本身對於維繫一個社會之必要與重要，正如同現在有許多人也是如此。

發現權威之必要及重要，而想重新建立一個新權威的，在辛亥前後，大概只有孫中山先生一人。（保皇，復辟都想恢復舊權威）。第一步，他先用民族主義的新權威來打倒滿清政治上的舊權威。（在這方面，浙派的革命黨人幫了他很大的忙）。辛亥革命的成功，也許如張東蓀先生所謂是練新軍，是換朝代的老套，而不是由於有產階級的士大夫，但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民族主義是主要的推動力。不過光是推翻實際政治上的舊權威是不夠的，必得建立新的權威。——於是乎有了三民主義。因此可以說三民主義的基礎建立在民族主義上面，卽這一次的抗戰也是如此。

四　三民主義的性質

民族主義是十八世紀以後的產物，所謂現代國家都是以它爲目標而建設起來的。它的構成要素之中，一個民族的文化是重要的一部份。但它既是現代的西洋產物，便也不能不注意其本身的必要條件：現代化。至於民權主義，則完全是新東西。在中國，主權是二千年來一直在君的。民是黔首，是元元，是君的財貨資本，故「子女」與「玉帛」齊觀，「宰臣」與「奴才」並名。古書上雖然也有「民爲貴」「天聽視我民聽」一類的話，但這却和商人們所謂「金爲貴」「市價要看貨色」差不多，是爲主人的利益而立論的。古書上也有「民主」這名詞，傅孟眞先生曾舉晉書載記石勒等自稱「民主」，我却記得尙書多方卽有「誕作民主，

罔可念聽」的話，當然也不是現在的所謂民主；那是說「君爲民之主」，反過來也就是「民爲君之奴」。孫中山先生之用民權而不用民主二字，我想是爲避免歧解，使意義更爲清楚。在實質上民權主義是百分之百的民主政治，無可曲解，也無可推諉。民生主義在求人民的豐衣足食，也注意到住和行，用時髦的話說，是經濟民主。要做到經濟民主，財產分配，土地政策等必須有革命性的改變，天然的要傾向社會主義，所以他在民生主義最後一講中曾說民生主義即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一類的話。（我是二十多年前看的民智書局版，不知現在流行的三民主義有沒有删改，因此也不知我是否已經落伍。）

孫中山先生要以三民主義來建立新的權威，因此三民主義的性質，第一必須部份保留中國舊有優良而適用於現代的傳統。第二必須勇敢的接收西洋現代文明的挑戰，接受並且應用其武器。第三必須預防共產主義的挑戰，用溫和的方法來避免可能的流血革命。他又鑒於太平天國的失敗，摧毀儒教，摧毀一切舊有倫理傳統是其致命傷，所以特別注意保存四維八德，（雖然他也說西洋人的道德比現在的國人好。）使支持數千年來社會組織的柱子不致因突然抽去而崩潰，他接受西洋文明，要以新的柱子來逐漸替代和鞏固社會組織。他用溫和的民生主義來改良人民的生活，同時也替這個社會打了防疫針，免得慘受共產革命。他在十三年改組國民黨以後，容納共產黨加入，宣布三大政策，很明顯的是爲對抗當時各帝國主義者支持並指揮北洋軍閥的腐敗統治阻礙他革命勢力的發展。

五　三民主義的成功和失敗

但終孫先生之一生，三民主義始終沒有被國人普遍認識。許多人以為他是好高騖遠，徒託空論。只有一部分不滿於軍閥的腐敗統治，為中國前途焦急，眼看舊權威失墜，茫茫然求索理想的青年，看到了三民主義，才如獲至寶，摩頂放踵去參加革命。三民主義成了國民革命的原動力，北伐才能迅速推進，可是手創者已不及見了。當時北伐軍的實力遠不如北洋軍閥，可是所向披靡，（這也證明實力不是權威）。使那些老粗的督軍聯帥之類莫明其妙，他們當然不知道國民革命軍找到了新權威。有人告訴他們：「黨軍有主義」。主義是什麼？原來如此，於是軍閥們也來「主義」，孫傳芳有「三愛主義」，張宗昌又有三什麼主義，他們以為主義是槍桿上的裝飾！（可憐現在還有人如此想法）。

所以如果我們說，北閥的成功，是三民主義這個新權威打倒了沒有權威的軍閥，大致不會錯。當時不但有志氣的青年往廣東跑，連幾個重要大學的教授都幾乎跑空了，留在五百多年故都的人，也都把中國的前途寄托在南方。北洋軍閥的倒行逆施，促成了全國智識分子對於三民主義的注意。所以在孫中山先生生前未獲充分號召力的主義，在北閥時竟成了權威，在一個沒有權威的空間，新權威是容易建立起來的，只要有人來主持和支持。

可是好景不常，接着是清黨與剿共，這有許多原因，這裏不說。就題論事，可以說是國民黨怕共產分子篡黨，奪取她的權威，而共黨也確有這個企圖。在和共黨分家以後，國民黨不能不修改她的政策。這也不必詳說，只要把十三年以後和十七年以後的政策一比較，便可了然。修改的結果，對內是兵連禍結，啓日本的覬覦；對外是再傾向於英美集團，（租界只

收回到九江為止），一度與蘇聯絕交。這一段現代史，在抗戰期中生長的青年却已不甚了然。

抗戰是一個轉機：使國民黨重新檢討歷史，再度與中共合作，停止鬩牆而共禦外侮。這個轉機的重要收穫，使中共也不能不承認三民主義為最高原則，不能不承認國民黨是抗戰的領導者　在初期，可以說抗戰又確立了國民黨的權威。那時全國人民熱烈團結的情形，眞使人回想到北伐初期的盛況。

但到後來，以國家的興亡來賭孤注一擲的抗戰，以抗戰的代價來重新建立起來的權威，又和人脫了節，又成了海市蜃樓。支持抗戰的共有兩種人：農村子弟拋兒別母上前線而不得一飽，智識分子經常捐出其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兩者又都受官僚與商人的榨取，餵肥了這些沒出息的賤軀。官僚只問權勢，商人只要金鈔，國家要不要綱紀，社會要不要權威，他們是不感到興趣的。國民黨政治的腐敗，使她自身失去了權威，智識分子生活的低落和被淘汰，使他們失去了支持權威的能力。由這兩種原因，再加上財產分配的極端不合理——幾乎是好人一定窮困，混蛋一定發財——使社會道德無底的墮落，貪污者自己固不以為可恥，不貪污的朋友，能沾他一點光，而不以為羞，也許還向人誇耀：這份禮是誰送我的，暗示你還沒有這樣闊親友呢！兩性關係的混亂，也達到了損害民族健康的程度。許多秀儍青年無法結婚，或已婚的無力贍養而分離。許多男女的性觀念也完全變質，五四時代青年男女熱烈討論「靈」「肉」一致，現在則變為「錢」「肉」一致。錢和享受往往列為最主要

的條件，一切可以任錢換取，當一個社會完全失去了平衡與道德，也就證明了原有的權威不再存在。孫中山先生所要苦心建立的權威，北伐時代和抗戰初期志士仁人流血換來的權威，給腐敗的統治打倒了。我們現在不能不宣告：中國已沒有權威。

然而現在一般人都知道並且承認三民主義是立國的原則，這個思想的權威可說在理論上依然存在，只是高高的懸在空中；目前進行着的事實正和它背道而馳。三民主義曾經是北伐的主動力量，民族主義推動並支持了抗戰，但政治上再無辦法，將可能崩潰於共產革命。民族主義的另一作用，似乎只有執行雅爾達密約，給外蒙「獨立」以自我解嘲。民生主義根本談不到，饑饉和兵禍只在加速民死。民權云云，也還在各黨派的荷包裏。然而朝野上下都在喊實行三民主義，看來正是知易行難，給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哲學——知難行易——一個尖銳的諷刺！

六　中國目前需要權威

中國目前的情況，如果再繼續下去，內戰完成了經濟崩潰的傑作以後，隨之以來的是更偉大的傑作：道德和人心的崩潰。事實上目前這二者正在猛烈競賽。在內戰的旅進旅退之中，每出入一個城市，雙方各對人民作一次仇殺報復的比賽，遠比現在南京提倡的工作競賽來得努力，遠比敵僞時期的屠殺來得慘酷，都充分發揮了原始的野蠻性，（我有許多證據）然而報上不見一字，卽使披露也引不起誰的注意，因爲自朝至野，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已習於內戰，慣見同胞的彼殺而無動於中，神經麻痺。誰來制止地球上這一部份兩脚

動物的慘劇？三人？五人？馬帥？司徒？黨派利益，本國政策，會對這一部份兩脚動物的命運低頭嗎？中國若再沒有一個權威（不是實力而是權威）來制止這個比螞蟻蟋蟀還愚蠢的慘劇，難道眞甘心做第三次大戰的開場戲嗎？

在實際政治方面，打算盤和經商成爲最高指導原則，北平以前的警察慣稱其上司爲「我們掌櫃的」，現在則連救濟總署的署長也必須懂得做買賣，才不至於被逼辭職。任何一個簡任以上的官，如果既不貪汚，而又不懂得做買賣，絕對養不活兒女

尤其可怕的是現在青年的苦悶、徬徨、莫知適從。他本能的知道思想要自由、進步，可是惡勢力警告他自由是「反動」，前進是「偏激」。他本能的知道撒謊是可恥的，可是打開報紙來一看，重要的國事，要人的演講，事後證明幾乎每件都是在撒謊，這還指有良知者而言。至於某些人所誇爲「馴良」的，則其思想已統制得四平八穩，非常衞生，絕無傳染病，也沒有危險性，他的看家本領是背十二條守則。剩下來的則頹廢與享樂，其心境和「十日談」中的人物差不多。這個精神上的創害，決不是短時期內所能治療，如果沒有眞正的權威來領導，這種現象可能延續到下一代。然而據說這一代就要負起建國的責任！

現在一般人另有一種恐懼，卽經過八年對日抗戰以後，中國雖然勝利，而其地位不久又將被日本壓倒，領導東亞的依然是日本。去年日本剛投降，一位老牌學者用貌似玩世而其實悲憫的口吻對我說，「你看罷，美國現在有兩個乾兒子。一個是中國，一個是日本。將來呢，」他劃支火柴點起了煙斗，「日本這個小子一定有依有順，美國人非常喜歡。中國一定

極不爭氣，扶不起的阿斗。美國人眞心想扶植中國，結果非逼他仍舊扶植日本不可！」那時勝利的狂潮尙未捲盡，現在則日本國內已事事都比中國上軌道。有的人已經在痛心地羨慕日本，軍國主義的權威剛被打倒，立刻又建立了一個權威： 思想，英美式的民主政治。 主持者，美軍總部——麥克阿瑟。 支持者：全國人民。當然，這樣沒出息的羨慕立刻被國家的自尊心所打倒——附帶的也還有些勝利的虛驕心。我們不能說這個沒出息的念頭，其內在的動它無愛國心機的分成，事實是事實，日本現在的工業、經濟，都在蒸蒸日上，日本上下的和衷努力，中國更不能相比，目前當然仍在亡國的狀態之下，解除了軍備，也無法內戰，可是二十年管制以後，我們的旅順、大連、兩條幹線，還捆在「友好」條約之下，半身不遂，而日本則又是一個強國了。並且，即使把台灣、琉球、千島、庫頁、朝鮮加起來，有半個外蒙大嗎？我們今日再不努力重建權威，停戰建國，二十年的競賽會趕得上日本嗎？照目前的國內局勢，中國的希望究在何處？

上文已經說過，在理論上，中國思想上的權威非不存在，雖其是否充分，目前要不要修正補充是另一問題，但它懸在空中，沒有主持者和支持者，徒然是海市蜃樓，反而引起了究竟是知難行易，還是知易行難這個矛盾。中國目前要建權威，比新起圖稿畢竟容易些，只要理論能夠被實踐。問題的核心是誰來實踐？誰來領導實踐？按理說當然是國民黨，但是國民黨執政垂二十年，黨徒徧國內外，至少到現在爲止還沒有證明她有實踐的能力；不但沒有實踐的能力，而且人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使三民主義有幾次可能成爲實際權威的機會都白

自失去。我甚至懷疑今之高級國民黨員是否每人都把三民主義（那怕是英譯本也好）從頭至尾看過一遍，否則何至於其施政行事這樣的違反三民主義。國民黨已失去領導國人重建權威的資格，不足以成爲權威的主持者，其黨員之濫、之偏、之馴良，也不足以成爲支持者。當然我們也不否認國民黨中也有優良進步的份子，但至少此時尙不能起什麼作用。我們也不否認國民黨領導抗戰的成績雖不佳，但確曾克服不少困難，但也須同時指出現在政府中若干中堅份子並非眞正國民黨出身，而是半途加入以共赴國難的，只能說是其外圍黨員。另一部分是職業的專家，志在爲國服務，不必專爲某黨。這只要看一下外交、工業方面的陣容，便可了然。這些英美派的專家如果不在黨裏，也許主持或支持權威的號召力更有效，他們入了黨同時也分了謗，對社會，和對他們自己在一種意義上反而是損失。

共產黨當然也頗想領導重建權威，如果我們把這問題提出來。但在客觀條件上，似乎更不如國民黨。第一，在政黨地位她已不能不承認國民黨的主義爲建國原則，不能不承認國民黨的領導地位。第二，由於她過去排斥小資產階級的錯誤，使她黨內人才的學識水準受了可憐的限制。第三，解放區的政績如何外人雖不盡知，但就其最近蘇北佔區內行動而論，很難得有能力支持權威者的擁護。第四，一國的權威必須有獨立性，一味依賴任何一個外國是建立不起來的。此外別的黨派都有與國共兩黨類似之點，而其通病之一是太注意黨派利益而忽略人民利益，只要看年初政協會議之承認舊國大代表，犧牲十年來受教育青年之選舉權而換取各黨派的府委政委，便可證明此點。

建立權威有二個必要條件：有思想的基礎，有適當的人士。前者幸而已有三民主義作爲藍本。（我不敢武斷說全國學者之中一定不能創造比三民主義更進步的思想體系，但目前爲使事體簡單化計，應以三民主義爲藍本）。後者的條件其實也頗簡單：只要其才識品德足以主持，熱忱毅力足以實踐這個思想基礎，而且眞能代表人民，不受私己集團的限制。能符合這條件的，即令其隸籍黨派只要能放棄黨派立場而眞爲人民，也有資格。但在目前情形之下，毋當是無黨無派人士更爲適當。我在觀察一卷第四期『誰能替人民說話』一文中曾指出：政治腐敗，像大學教授這樣的匹夫應該有責糾正。重建中國的權威，當然比澄清政治更爲根本，更爲重要。只要權威能建立得起來，澄清政治倒是其餘事了。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

一

中國如要求生存，最迫切的是一個現代化的問題。儘管目前烽火遍地，民不聊生，而此事仍不能視爲高調。因爲我們不能坐等一切上軌道以後再動手；即使許多工作要待國家安定以後能動手，但說到動手就得有人，而我們要建現代國家，就得有現代觀念的人才。我們不能想像以今天社會道德的墮落，政治觀念之落伍，文化學術的萎縮，可以担負使中國徹底現代化的責任。我們要做這份工作，首先要具備一切可以培養現代化的人才的環境。總句話說，先要建立一切社會道德的基礎。現代化和建立現代科學的道德基礎是分不開的。

二

但我們這裏所謂道德，却和今日大人先生們腦中口頭的那一套大異其趣，决不是數東方文化的家珍，或什麼精神文明，什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那一套夢話。中國是世界上談道德談得最久的國家，現在又是許多人提倡固有文化，特別國情，四維八德，精神訓話最努力的時代，而實際上却是道德墮落到最不可救藥的一個社會。在現代的國家中，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社會像今日中國社會這樣，公然鼓勵打風殺風，保障貪污，不守諾言，剝削人民權利，而看看大人物的講詞「訓話」，固無往而非忠、孝、仁、愛、信、義、

和、平。無時不在談道說德。「言教」與「身教」的不一致，從未有如今日中國之甚者。

我起先以爲這是今日中國政治環境中一時的現象，但仔細一想，實在我們祖先的文化之中，雖然裝滿了一些「道德」的字樣，却並沒有給子孫以眞正道德的遺產，至多只是些講「利」「害」的話頭。講世故的法門。中國素以儒教立國，儒家以六經爲本，而六經之首的易經，也只是些「無咎」「有悔」「既濟」「未濟」的「利」「害」話。詩經是民歌，除了僞序以外，本無善惡可言。書、禮、春秋，只能當史料看。而據說是傳春秋的左傳，記得最有聲有色的也只是「殺」與「淫」兩件大事　戰國時代最講道德的學派是墨家，而最不合這個「特別國情」，最短命的，也是墨家。漢代號稱尊孔崇儒，以孝治天下，而開國之君劉邦，卽曾向他的政敵項羽討自己父親的肉羹吃。他父親說他不如老二會治產，卽位後反問父親：「他的產業比老二那個多些」？對臣下開口閉口稱「乃公」（用現在的話說是「你老子」），這一種侮辱別人母親的風氣，一直傳到現在。雖然漢代每一個帝的謚法上都加一個「孝」字，後世如法泡製。孔子論政說：「民無信不立」，而劉邦答應人民除秦苛法，約法三章，以騙取父老之心，却始終未守諾言。直到文帝才除秦代傳下來的肉刑，到武帝才除秦代統制思想的「挾書之令」，而他自己也罷黜百家，　消極的統制思想。秦政焚諸子百家之書，只許保存種樹醫藥之書（用現代的話說是只要「實用科學」）。固然爲人指爲愚民政策，而東漢之提倡圖讖，僞造了許多緯書，導士民入於迷信神權，與秦政也只是百步與五十步之別。至於歷史，自左傳國策以下，講得最精采的是權詐世故之學。二十四史之中，無書

不講世故，教人如何做鄉愿，如何「明哲保身」，因此後世的統治者幾無人不尚權詐。英國人常說：Honest is the best policy"，中國統治者的腦中不但無此觀念，且必笑其迂闊。有二千多年如此這般特別國情的歷史，難怪儘管提倡道德，而道德始終不見發揚光大。只有在政府不大提倡道德的時候，倒會產生一些有骨氣的人。近人好罵漢末魏晉人物之反抗禮教，道德不好，實則二十四史之有獨行傳，隱逸傳，起於後漢書，而魏晉人士與外來的印度思想一比較之後，才看出儒教文化的缺點，才有高僧、逸士、嵚奇磊落的人物，才有點遠見大度：愛好眞、善、美、敢於反抗傳流，反抗統治者，減少中國史上一些鄉愿諂諛的穢醜態。並且，也只有在魏晉時代。儒教的權威失墜以後，一般士人的聰明精力不爲六經所限，才有點自然科學的苗芽。如華陀的解剖學，祖冲之的算學，道教的藥物學，以及星經水經的成書。但魏晉以後，除時代較近的唐人尚能欣賞此種風氣外，直至今日，大都以痛罵魏晉來自標其道德高尚，以主張讀經來表示其提倡道德。

三

說到自然科學在中國之所以不發達，我想，以儒教爲標準的教育觀念，是一個很大的原因。儒家思想只注重人，而不注重物。「玩物喪志」是儒家所深戒的，「奇技淫巧」尤爲儒家所深惡痛絕。而自然科學的起點，却正要「玩物」，其方法，却正要「技」「巧」。其動機，正因爲「好奇」。對於自然界的現象，至多只想利用而不肯研究。荀子說：「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已經算是進步了。但也只想「制」

和「用」而不肯「思」。殊不知不思如何能物畜？如何能制？如何能用？他甚至又說，「唯聖人爲不求知天」。自然界現象，他以爲是「天職」，人不要「與天爭職」。有了這種觀念，如果有一個孩子，因爲好奇，在雷雨中放風箏，必爲師友父兄所痛責嚴禁。如果有一個人，弄了許多瓶子，放些肉類食品在內，要看怎樣才發霉發臭，亦必爲師友父兄所厭惡禁止。這種情形，恐怕到現在還是如此。而電學和微菌學，却正是這樣發明的。有了中國這樣的特別國情，寶貴的精神文明，光榮的聖經賢傳作爲教育基礎，我們還能希望產生富蘭克林或巴斯德嗎？

科學和道德這兩件事似乎沒有關係，一般人通常以爲中國科學雖不發達，然而是一個道地的道德古國。近來爲了政治的原因，此種說法尤盛極一時。照我上文所說，中國不但向來科學不發達，連道德都極差。並且這兩件事極有關係。大家知道科學的基礎是哲學，尤其是哲學中的邏輯與認識論部份。中國雖然號稱頗有哲學，可以寫成很厚的哲學史，但按之實際，中國哲學史中百分之九十是哲學中最不重要的部份——人生哲學，倫理學，講講做人的道理。並且因爲缺乏宇宙論和美學，連做人的道理也講不透澈，仍不免從人情世故，歸結倒怎樣做官，「應帝王」，亦即從正心誠意講到修、齊、治、平。正心誠意一段還是要靠禪學來幫忙才講得好。墨翟，公孫龍子等所講的邏輯，因爲不合「特別國情」，早就無疾而終。後世的因明（邏輯），聲明（語音學）、唯識（認識論），都是印度來的，（因爲印度尙有爲辯論眞理，賭辯者的腦袋的風氣，玄奘在那爛陀寺即曾與外道勝論大師順世賭辯過一次）。

而且作儒教一度失勢時才有人講，不久也就停頓　受了儒教訓練的中國人不喜歡純粹哲學只喜歡功利哲學，做官哲學。所以知道玄奘者還有人，知道鳩摩羅什者已不多，知道窺基者眞是絕無僅有了。近來有人談唯識，還是楊仁山從日本搬回來的風氣。中國既然歷來就不喜純粹哲學和邏輯（孟子與告子辯論性善問題，莊子與惠子辯論魚樂問題，最可看出孟　莊二人不管邏輯，強辭奪理。而一般讀者多是孟、莊，而非告、惠，可見其人之不愛眞理或懶於思攷）。自然不耐煩思考身外的抽象理論。因此便沒有愛眞理的熱忱和習慣。「吾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這樣的懶惰話可以傳下來，而「多方」的惠施，五車之書竟不留片札，這與儒教的得勢當然有關係。研究自然科學的另一必要條件是愛眞理的熱忱，再就六經本身而論，我不記得有西洋人所謂「眞理的觀念」。說文給「眞」字下的定義是「僊人變形而登天也。」莊、列所謂「眞」是本、原。（如云「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也與「眞理」之眞不同，其他佛道兩藏中「眞」字意義也不同，都有點陰陽怪氣由於中國人對於眞理觀念之薄弱，所以六經雖被尊崇，卻常常要加入一些僞材料進去，儒家的士大夫不以造僞爲可恥，爲瀆聖，因爲儒教以功利教人，而當帝王求書時，造僞是可以取得功利的，於是大量的造僞。這當然是一個道德問題了。六經傳到今日，幾無一經沒有僞作，易經中有太極圖、河圖、洛書、僞連山，僞歸藏。書有僞傳、僞古文，詩有僞序，禮經也是一篇糊塗賬，春秋有僞緯書，連竹書紀年都有僞的。自宋至清，自歐陽修、吳棫、朱熹、陳振孫、王柏、以至閻若璩、胡渭、崔適、康有爲、胡適、顧頡剛，數千卷的經解專

集，辨不完的僞書爛賬！儒家如此的不愛眞理，喪盡學術道德，則以儒教爲權威的國家，如何能培養探求眞理的風氣？如何能發展自然科學？

儒家以功利教人，其終極目的是「應帝王」，孔孟仁義之說，算是講爲人之道的精采部份。然與客觀的眞理無關。宋人講格物，已受外來思想之影響，而格來格去又格到心上，仍離不開人，所以也不能走上科學之路。老莊要去「是」「非」觀念，使後世以「是非」爲「口舌」「麻煩」的同義詞。法家對治道雖有貢獻，而先要教人揣摩心理，諂諛權貴，狎弄人主，然後能行其政策。（見韓非說難）。並且法家也注重功利。總之，中國的傳統文化教忠教孝，最好的效果只有爲一姓之爭而甘誅十族，爲倫理上的尊長而臥冰割股，却沒有爲客觀的眞理學術而奮鬥犧牲，像蘇格拉底、葛理略之所爲。（六朝至唐的高僧大德間有此精神，但以宗教爲動力，並且公然脫離固有文化）。因此，探求眞理的工作，純粹科學的研究，其出發點既與倫理無關，其精神與方法尤與功利無關，在中國文化中自不能發達，即偶爾有傑出人士爲之，亦必爲傳統文化所壓迫而萎縮放棄。梁漱溟先生在研究中國文化的特徵時，深致怪於「中國不能有科學成功」，數千年「一退而不進的現象」。我想，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身，即已回答了這個問題。

只重功利，沒有篤信眞理堅持眞理的觀念，表現在政治方面的，也必然趨向於政治道德的墮落。每當易代之際，開始的時候即使有高遠的理想與主張，一旦取得政權，立即爲功利觀念所征服，只知擴張權勢，聚斂財富。如果也還在提倡倫理道德，都是因爲倫常道德可以

做功利權位的奴才和工具，非有眞愛於倫常道德。（只要看骨肉相殘，妻女穢亂之事在帝室王族中遠較平民爲多，即可了解此點）。至於原先所標榜的理想主義，早已擲在腦後，或僅僅作爲裝飾廣告。自梁惠王至於國民黨，殆無不如此。所以沒有篤信眞理的精神，不但科學不會發達，連社會道德也建立不起來。

四

原來研究自然科學，探討客觀眞理，其本身即需要有極大的道德力。第一、其動機必須純潔，不爲功名，不求利祿。眞理本身，亦不必爲了人類的實用而去研究。葛理略之摧毀地爲中心說，發明地爲太陽系的行星，不但無利祿可圖，且冒當時之大不韙，受盡教廷的慘刑，而其說本身，初與人類功利亦無直接關係。中國古籍中僞書之多，即爲功名利祿觀念促成的。其次，其方法必須尊重客觀，如與客觀的證據衝突，自己的意見必須犧牲，反之，敵人的意見必須承認。否則即是不道德。隱匿或曲解證據尤不道德。第三、其態度必須摒絕勢利。不論權貴，尊長，親友私好的學說，凡與眞理相悖者，必須捨前者而取眞理。西洋在兩千年前，即已有吾愛老師，更愛眞理的見解。中國到現在還以篤守師說爲風尚，明知師說錯了也要替他圓謊。學生的才智如不及老師，又不敢出其範圍，學術就越傳越稀薄。最後，從利觀念出發，發展到「學以致用」的觀念，也消極的不鼓勵對於純粹知識的探討，沒有爲學問而學問的精神。可是西洋近代文明中幾種震撼世界的劃時代的學說，如上述葛理略的太陽中心說，達爾文的進化論，馬克斯的資本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乃至構成原子能學說的

若干理論基礎，如原子論、量子力學、原子序數表、物質變能的理論、光波、放射線的計算、大體溫度的測算，初起時都是純粹知識的愛好，客觀眞理的探討，並不是爲致用而學的。至於實用科學的發明，都是純粹科學的結果，副產品。近代科學文明的因、果、本、末，不能不先弄清楚。中國人一來就要講學以致用，生怕無用之學白耗了精神，功利的算盤打得太精，妨礙了對於科學眞理的探討。

五

我們今日所受了如此這般一套世故、功利、懶惰、權詐、諂諛、作僞的文化，而猶自詡禮教道德的「精神文明」，毅然欲與今日西洋探求眞理的，不可思議的「物質文明」相頡頏，念念不忘於寶貴的「特別國情」，雖受過西洋教育的留學生也不免，眞不知是自欺，還是欺人？在另一方面，這些人固然也知道自然科學之可貴，但是受了二千多年近視訓練的結果，只看見別人的飛機、大砲、雷達、原子彈，依舊在功利方面打算盤，在致用上面下工夫。所以即使提倡科學，也是獎勵實用科學而忽視純粹科學，前幾年大學招生限制文理學院人數，而以全公費給予工農學生，至今留學政策，猶復如此，便是這種眼光的具體表現。捨本逐末，棄因求果，說起來可笑可憐，而倡導者不以爲恥：因爲他們預先武斷西洋科學只是形而下學，只配「用」，中國的「精神文明」才是形而上學，才是「體」。以「中學爲體」，要在無經無僞的六經中安身立命，學習爲人治學之道，再來應「用」別人家以生命換眞理的科學產品，乃至希望發明新的科學；這不僅是笑話，實在是悲劇。

至於在社會政制方面，「中華二千年文物制度粲然大備」這個觀念，也拒絕了一個現代國家所必需具備的充分條件。「民主」成爲市場上討價還價的行情，「人權」成爲統治者何何異慈善的恩賞，「法治」是只要人民守法，統治者無須遵守的訓詞。因爲「民主」「人權」「法治」云云，是西洋物質文明之體，非華夏「精神文明」之「體」，是「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的，苟能得已，自然還是坐飛機吃西菜，而用無線電廣播「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這一套精神文明，最合理想！其實說穿了不值一笑，凡是主張一面復古（中學爲體）一面工業化（西學爲用）的人物，僅僅表示其人尙不了解西洋文化，尤未懂得中國文化，「自卑疙瘩」(Inferiority Complex)在作祟，不能不這樣說以壯自己的膽能了。

但是處在目前的世界上，誰都看得出來，中國今後的問題並不能任憑你來提倡復古，我來提倡實用科學，他來維持本位文化、特別國情。中國已不復是華夏、禹甸，而是現代高度科學的世界的一部份。這一部份能夠趕上並適應其餘的大部份，便能生存繁榮，否則慘不忍言。要趕上適應，必須現代化，要現代化，必須從社會道德到政治制度，從文化觀念到治學方法，從待人接物到世故人情，從生產工具到分配原則，澈頭澈尾的改造重建。本文只是提出若干必須重建的理由證據，如何改造，怎樣建法是另外的問題。

蘇格拉底爲了眞理而被控訴處刑，其罪狀是他摧毀了希臘原有的許多上帝，向青年人另造許多上帝。中國古代卻有獻僞造的經書以博利祿，結果被隋煬帝殺頭的儒者。我寫完此文，想起這兩個故事，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卅六年四月十八日

中國文化與民主政治

我在上文論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曾舉若干證據，指出中國文化中道德成分極差，其文化本身又根本不適於探討眞理，發展自然科學。對於愛好中國「本位文化」者，必將目爲離經叛道。但我沒有資格負這個責任，因爲我只是用現代化的尺度去量中國文化，爲現代化的需要而論中國文化。原來這個離經叛道的責任是應該由「現代化」去担負的，如果今日中國可以遺世獨立，仍舊過着原始的農業社會的生活，我們衡量中國傳統文化的標準又自不同。同樣的，構成中國文化的歷史人物也不負今日所謂不道德、不科學的責任，至少事實是如此，例如造僞書，替僞書辯護的人不但不以爲可恥，而且還以爲是在「衞道」。

中國今日的問題，不但是個科學化的問題，而且更是個民主的問題：在原始的農業社會裏，不但科學化是不必要的，玩物喪志是應深戒的，並且民主也並不必要。近來有人提倡本位文化，說正統的儒家也有民主的學識，證據當然是孟子，他主張民爲貴。當然，書經裏還有「天聽自我民聽」「民爲邦本」的話，國策裏也有先問「民無恙」後問「君無恙」的故事。但這至多只能說是民「本」思想，決不是民「主」思想。本是本錢，是資本，正是現代所謂政治資本，資本當然可以視爲工具，工具只能爲帝王所用，決不能作帝王的主人。孟子說過：「勞心者治人　勞力者治於人」。他也主張愛民如「子」，夢想着文王時代的「庶民

「子」來」。而在那時候，「子」「女」是與「玉」「帛」並稱的，都是統治者的財貨資本所以那時所謂「民爲貴」，和現在商人所謂「金爲貴」差不多；而所謂「天聽自我民聽」，也就等於說：「行情要看貨色」。而趙威后問齊使的故事中，粮食又放在人民前面。可以看出即使在自由思想的戰國時代，也決沒有想出古代希臘的民主觀念。孟子如果聽見了當今學者恭維他有民主思想的話，他一定來函更正，並且嚴重抗議，因爲否則梁惠王和齊宣王之流，一定要對他不客氣了。至於後世自以爲奉儒家道統的人，更不必說。反對佛教，而自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以後應該有他來傳衣鉢的韓愈，人民如果認爲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這樣的「本位文化」，而居然有人還能在這中間找出民主思想來，豈非奇蹟？如果說，明夷待訪錄中可以尋出一點民主的嫩苗，那是夾在一個歷史上最黑暗的統治和被異族征服這兩個時代中間的呻吟，除了可以利用來作爲推翻異族統治的宣傳以外，也沒有起別的作用。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民既然是統治者的資本，愛惜人民也和愛惜玉帛差不多，「民胞物與」本來是連在一起的。民主的最基本條件是保障人權，重視人權，則是中國文化中所沒有的。玉帛是儒家所謂「禮」的象徵，也是兩周祭祀大典中主要的物品。在莊嚴的祀典中，玉帛是和牛羊和人一起當作祭品的。「用人」和「伐」的祭禮，甲骨文中即有許多記載，和「用牲」完全一樣。「用人」於社，左傳中也有記載。以人殉葬，也是儒家所尚，有人用「俑」來代替，孔子還駡他「其無後乎」！因爲俑不是眞貨而是假貨，孔子叫作「象人而用之」，

這是不合乎「四維」之首的「禮」的。「吃人」的說法，也決不是誇大的形容詞。遠古不說，近人最愛誇漢唐文明，而漢代的劉邦就最愛「烹」人，他是連他父親的肉都想吃的。唐代的渤海諸葛昂在酒席上和朋友賭闊，曾叫他一個絕色的愛妾，先出來行酒，不久便把她蒸熟了，裝在一個大盤子裏，塗上脂粉，端出來請客，客人不敢吃，他先撕開她胸前的紗衣，擘乳肉來吃。這些故事，可以使 Swift 的名作 Amodest Proposal，完全失去諷刺的意義。用仇人來活祭之風，是到現在還流行着的。剖徐錫麟的心肝來活祭恩銘是清末的事，我上月接一個親戚來信，說他們縣裏捉到了年前的僞縣長張鵬舉，正預備在公審之後活祭被張殺害的人，不知現在祭了沒有。此外如以女人當貨幣，拿來換馬，換書，則不但認爲無妨人道，而且正是構成本位文化的雅舉韻事，爲詩人們所讚賞歌詠的。

我們卽使承認中國文化教仁教義，滿是道德，但是一面教人做聖賢，一面卻承認用人來祭祀，來殉葬，來釁鼓，來煑熟了吃，來當貨幣用，來公開活祭，數千年來熟視無睹，從不發生，「人權」的問題。今天忽然要在這些可以把人祭祀、殉葬、煑吃、活祭的本位文化中建立保障人權的觀念，並欲藉此觀念以建立民主政治，這也是強愛好本位文化者以所難，未免不合這個「特別國情」，

再說中國的本位文化把人當「物」，倒不限於儒家，左傳中所謂「物不能兩大」，及一般稱人死爲「物故」，這都是以人爲物，荀子說：「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這一物正指一般人。魏晉之間，稱人爲物的風氣更加普遍，如盧志問陸機云：「陸遜陸抗是

君何物？」山濤見王衍說，「何物老嫗，生此甯馨兒！」這是連別人的祖、父和母親都可以稱為物的，至指小兒為「英物」，女子為「尤物」，都無惡意。人物連稱，如世說新語記王坦之和伏滔習鑿齒「論清楚人物」。洛陽伽藍記「爾朱榮人物委瑣」。直到現在，我們還是以人物連稱，也不覺異樣。這雖然是一種風尚，卻可以看出這個觀念的起源，由於沒有把人從別的物中特別提出來給以人所應有的觀念。這種風尚，也正和上文所指出的「子女與玉帛並稱」相配合的。既然是物，自然只好由「天子」牽着走，不能讓彼牽者知道牽到那裏去。用聖人的話來說，則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近人愛作翻案文章，替聖人辯護，說這兩句應該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想大可不必。因為果眞如此，倒是和「用人」「殉」……這一套本位文化不相合了。

所以本位文化也許誠然有許多好處，那也是祖宗們的事，與子孫無關；而且祖宗的袞服珠履，孝子賢孫也未必穿得着，倒是祖宗們的劣根性，卻不容易革去。中國要求現代化，文化的遺產既阻礙自然科學的發展，也妨害民主政治的培養，民主政治的基礎應建立在人權上，而中國卻並沒有把人民當作人看待。父母生了子女，把他養大，主要目的是要他「孝」。孝是子女應該給父母的報酬，所以養子女是投資，將來要收回利潤的。最明顯的證據是父母生病，子女割股，是被認為最忠實的履行付息義務。嚴格說來，在中國的家族制度之下，以及家族本位的文化之下，到現在還只有「家」人，沒有「國」民。

上文拉雜所記，使我們感覺到中國如果要實行民主政治，抗着這個本位文化的十字架是

跑不動的。卽使馬上折下，也已因爲抗了幾千年，抗得精疲力盡，非好生補養不可。如果今天還有人主張要把這十字架抗下去，那顯然是對於民主根本沒有興趣，也不要使中國現代化。這些人也許是對的，因爲中國的不進步對於他們有好處。

附記，上期本文所說中國傳統文化把「學以致用」教人的「功利觀念」，也和現代西洋人的功利主義不同。西洋的功利主義，在十九世紀可以英人邊沁爲代表，所以也有人稱爲邊沁主義。他所謂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是指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近來可以美人杜威爲代表，他主張實利主義(Pragmatism)，是指所學可見諸行事，這都是對於社會的功利，而不是爲學者本人的功利。中國人所提倡的卻是指自利的功利，至多包括家族的功利，所謂「顯親揚名」，「榮宗耀祖」，「某業所就，孰與仲多？」「一人成仙，雞犬登天」，均是。卽以近事來說，前兩年教育政策亦可說明此種精神。學實用科學的學生可以得全公費，在未利天下之先，先利他自己再說，這正是提倡功利主義者的本意。西洋人和中國人腦中的功利觀念之不同，因爲西洋人是生活在社會中的，而中國人是生活在家族中的，所以若有人誤會以爲我說中國文化重功利觀念，正與邊沁和杜威的學說相暗合，那又是不懂得中國本位文化的眞精神。

論學術道德

一

在這時代談道德，似乎有點不合時宜，至少將被一般人目爲迂腐。因爲照目前中國的情形，政府不以腐敗貪汚爲可恥，政黨不以分贓食言爲可恥，整個國是，不以自相殘殺爲可恥，不以破壞人權爲可恥；社會各方，不以非法牟利爲可恥，不以謊騙詐諛爲可恥；總之是，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日本打敗了，外蒙獨立了，似乎已經沒有敵國外患；制憲成功了，政治民主了，也不必再有法家辟士。此時誰有勇氣衝破道德的藩籬，誰便能夠獲得最大的利益，最高的權位，最闊的享受；在今日而尙從事於學術工作的人，已經是不識時務，活該倒霉，再要談什麼道德，豈非迂腐？但我們這個國家如果不想上進，永久甘於處在殖民地的狀况之下，仰他國之鼻息，供他國之驅策，則不妨讓目前的情況繼續下去，不合的社會畸形發展下去，正在發育的靑年，由他們一任各種不良風氣引誘下去，抗戰八年，幾千萬人的血算是白流！如果今日還有人眞想重建國家，補償這次大戰中精神、物資的損失，在這一代的靑年身上寄託建國的希望，準備一個可以使國家現代化的環境，則我們決不能忽視這個看似迂腐而其實急於燃眉的道德問題。

一提到道德二字，自有許多心死已久而腦滿腸肥的人物哄然訕笑，嗤之以鼻；也許多貧

綫時會而十分得意的人物貌似首肯，暗譏落伍，對於他們，除了貨利權勢，任何話都是白費。也必有許多開口「精神文明」，閉口「人心不古」的人物，聞此欣然色喜，以為吾道不孤，德必有鄰；對於他們，也請暫勿高興。中國今日所面臨的是一個現代化問題，在現代國家之中，只有科學文明，決無堯天雨露。科學文明的道德，比他們理想中的「三代盛世」，可以「比屋而封」的道德，要高明得多，嚴格得多。所以本文之作，絕不是為上述三種人，雖然他們如願虛心學習，也是好的。我們現在的希望，只寄托在担負建現代化國家責任的青年身上。現在的青年大都在學校裏，若論整個道德問題，眞是「茲事體大」非短文所能盡。其中錯綜複雜，往往牽涉到過去八年和現行的教育政策與制度問題。例如思想統制與奴化——這並不指淪陷區。如限制文理法科的招生與留學，鼓勵實科訓練，既有嬴政「提倡種樹醫藥之學，尙禁燬諸子百家」的流風遺韻，又使青年受了急功近利的短視訓練。如「貸金」「公費」等等，旣使青年有不勞而獲的僥倖心理，而種種手續，事實上又往往使他們非揑報謊報，則凍餒堪虞；潔身自愛者，已覺其難堪甚於「嗟來」之食。——凡此種種，且留待當代的教育專家們去研究罷。本文所要說的，只限於學術研究範圍之內。這樣一限制，似乎與青年的處世為人之道並無多少關係，實則一個人如果對於客觀的眞理有信仰，治學的方法守道德，則其人格的基礎早已奠定，所謂處世為人之道，也可說只是學術之一端，自然也包括在內了。

在未論到這個問題之前，尙須說明一點，即在抗戰時期後方統制教育所給予青年，尤其

是中學生，精神健康之損害，實在是一個無比重大的。在這裏不必詳述，但可略說統制的結果，即在使比較聰明的，不甘受統制的或流於頹廢享樂，或流於偏激，或從此根本瞧不起當局，對任何事都失去熱忱與信仰。中智以下，則大部精神受了麻痺，思想變成貧血，有的催被催眠了，也許應該叫作螢化了，有的却老實勿客氣奴化了。這種慘果，對於使中國今後現代化的準備工作，亦即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學術道德這根本問題，增加了許多的困難。因為物質的復員還容易，思想的復員却很難！

二

現代化的國家必須從現代學術上建立其基礎，而現代學術的基礎則是客觀的眞理信仰，尤其是現代自然科學，其發展過程，可說是一部客觀眞理的奮鬥史。我們兩千多年的文物制度，未嘗不粲然大備，然而就因為缺少這點基礎，和現代文明的國家一接觸，立刻吃了大虧，幾乎有亡國滅種之禍，淺見者流，以為只要「船堅砲利」（現在要說雷達飛機原子彈），便可以救中國，今之提倡實用科學，限制文理法學科者，其思想未脫「船堅砲利」說的餘毒。如果現代文明眞能如此廉價便可取得，張之洞、李鴻章早已救了中國，無需乎孫中山先生四十年的革命，也不致有八年的苦戰了。凡稍習西洋史者，都知道現代科學的始祖是伽利略。因為他發明了一個望遠鏡，發見了地球不過是太陽系中一個星，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他用拉丁文（給上流社會看的）和義大利文（給老百姓看的）著書立說告訴人類宇宙的偉大，地球的渺小，摧毀了過去妄自尊大的心理，重新估計人類的價值，才啓發後世西洋人自覺的努力，

打破中古時代宗教的迷信，使歐洲脫離了所謂黑暗時代；才有今日的科學文明。但當時伽利略發表了他的「太陽中心說」以後，因爲破壞亞歷斯多德以來「地爲中心說」的傳統觀念，曾經招致當時社會最猛烈的攻擊。羅馬教廷用盡了一切威脅利誘的方法，強迫他悔過認錯，他因爲不肯背叛眞理，曾被教廷秘密審問，備受人間慘毒的刑罰。這種不爲利祿而堅信客觀的眞理的道德，比起我國歷史上爲一姓之爭而甘誅十族價值如何？我翻這些舊賬，並不是長人家志氣，滅自己威風。我不過要指出兩點：

第一，近代西洋的科學文明，完全靠幾個篤信眞理的學者建設起來的。試想中古時代羅馬舊教風靡天下，一言不愼，立刻會蒙異教徒的惡名，有殺身之禍！在這樣的高壓之下，那些人立一新說，既不能博當世權貴，又未必有身後聲名，爲的是什麼？無非是心智所見，不肯泊沒眞理，才不惜冒生命之險，以求人類的進步，遂使西洋進到現代文明。孟軻說：「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他說的是一個抽象的道德原則，而中國人向來只把這原則應用在倫理方面，換句話說，只用在爲人處世的道德上，却沒有人用在探求眞理，篤信眞理這方面。南北朝以後的高僧大德在信仰方面雖有這種精神，却又偏於宗教，中國科學之所以不發達，我想這也未嘗不是一個原因 倒是西洋的科學家，他們在信仰眞理這一點上，眞有孟軻所謂大丈夫的精神。我們現在談現代化，老是等人家發明了科學用具，買來現成享用是不夠的，也是沒出息的，甚至我們自己也學些實用科學，製些用具或代用品，也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在普遍與高深兩方面趕上國際的科學標準，才能也有所發

明，才配列於世界強國之林。而談到發明，雖有許多條件，而篤信眞理却是最重要的一個條件，並且是可以自我決定的。

第二，我要指出現代西洋科學文明的發達，並不是單靠「形而下」的「器」「用」造成的。世界上沒有一種文明可以脫離了「形而上」的「道」而能存在，發展一切器用，都是從這特殊的「道」裏發生出來的。這裏所謂「道」，也稱爲「精神」，也稱爲「意識形態」有些人稱西洋近代文明爲「物質文明」，彷彿他們沒有精神文明似的，這是不但不合事實，而且不合邏輯的。張之洞之流的「船堅砲利說」之所以救不了中國，不能把中國變成同時期的日本，便誤在「中學爲體（卽道、精神）西學爲用」，這觀念上面。而時賢論者 頗有主張恢復張之洞理論的，不知是事理不明，還是故作驚語？若另有作用，則是學術上的不道德。我們在都市中時見有闊人家結婚，前面一列銅樂隊（奏的也許是西洋的喪樂），後面一輛結綵的迎親汽車，開得比駱駝還慢。這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最好例子，假使發明汽車的人見了，一定哭笑不得 西洋現代的所謂「物質文明」，自有它自文藝復興以來的「精神」基礎。假使伽利略也有東方聖人那種『呼我爲「牛」，以「牛」應之；呼我爲「馬」，以「馬」應之』的精神，一經反對便放棄了他的主張，或者爲了個人利祿，不惜昧着良心瞎說，試問西洋會產生現代的科學文明嗎？所以如果我們沒有他們的科學精神「爲體」，卽使買了他們的工具，也是不會「用」，不配「用」的。甲午海軍的質量並不比同期的日本海軍差；但是效果如何？原因很簡單，日本是變法，學了西洋的「船堅砲利」（用）更學他們的

政治法制（體）。郭嵩燾作當時卽指出此點，他在倫敦，見日本的貴族青年學法制者佔最多數，學船砲者極少數，所以他說：「兵者，末也」。但郭嵩燾因有這種見解，是被當時的愛國分子目爲思想有問題的危險分子的。中國當時主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體既千孔百孔，用亦無所附麗。這樣血淋淋的教訓難道還不足以發人猛省，僅僅半世紀的時間就忘得一乾二淨嗎？

三

其次論治學該守道德。中國是一個最愛談道德的國家。但我們且不說別的道德，若論到學術道德，實在不很高明，雖孝子賢孫，亦無法爲之諱。六經是我們的「國粹」，可是沒有一經沒有僞作。卽以尙書而論，自孔壁古文以至漢宣帝河南女子所獻「泰誓」張霸的百兩篇尙書，梅賾所奏的古文尙書，姚方與所上大航頭尙書，作僞造假，眞是「何以蔑有」？不知費了學者多少腦筋，直到淸初閻若璩才算把它弄淸楚。其他易經則僞「連山」「歸藏」，春秋則有種種緯書，詩經又有僞序，禮經也是一篇糊塗賬。卽不論宋代歐陽修、吳棫、朱熹、陳振孫、王柏諸人的辨僞工作，兩千多卷的皇淸經解中有好幾百卷是辨僞工作，這是中國學術史上許多學者精力的對銷——一面造僞，一面辨僞！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造僞的表面原因當然是爲利祿），我不知道留心中國文化問題的學者們有否想過？據我想來，還是由於中國人對於「眞理」觀念的薄弱。中國文化史上有一件平凡的事實，說出來大家也許要驚詫，六經中沒有西洋人所謂「眞」「善」「美」或「眞理」的「眞」字！說文給「眞」字所上的定

義是：「僊人變形而登天也。」（！）連先秦諸子所謂「眞」，也沒有眞理的觀念。莊子所謂「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眞者精誠之至也。」都不是客觀的眞理之眞，其他「眞人」「眞君」「眞宅」，更是玄之又玄。「眞相」「眞如」「眞言」又都是佛教中語，亦與西人所謂眞理不同。因爲眞理觀念之薄弱，甚至影響到是非觀念。孟子雖然提倡「是非之心」莊子却說：「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其意若曰：「非者固不是，是者亦未必是。」後世「是非」二字連用，成爲「口舌」或「麻煩」代替詞——多是非，惹是非，等於多口舌，惹麻煩。因此歷來對於客觀的眞理，既乏探求的熱忱，更少篤信的意念。清代考據家頗有求眞的精神，但又爲材料所限，其貢獻也只在故紙堆中。所以我們今日要研究科學（不論是自然科學或人文科學），探討眞理，不但物質的條件不夠，連精神的憑藉也太貧乏。中國學者素愛標榜「師承」「家法」，而西洋二千多年前的大師就說：「吾愛吾師，但更愛眞理」。（雖然韓愈也有「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的說法，但他又是在講「賢不賢」的倫理，不是「眞不眞」的眞理）。因爲講師承，學生不敢違背師說，學術受了限制，越傳越稀薄，當然只有退步了。因爲講家法，於是乎有門戶之見，於是乎有黨同伐異的惡習（而所黨所伐者，不幸又不是爲眞理的辨駁，而大都爲意氣之爭）。所以我們今後對於任何學術問題，先要定下一個嚴守眞理的道德信條。爲了這信條，應有不惜任何犧牲的决心，違反這信條，不論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道德。依此信條，就其大體而言，至少要做到下列各點：

第一，學術是最客觀的，所以要屏絕一切主觀與成見，尊重客觀的證據，不論自己怎樣

愛好的意見，如果與客觀的證據衝突，必須割愛放棄，或加以修正；不可阿其所好，固執成見。孔子所謂「毋固，毋意，毋我」，亦不外此意。一個人要改變一個已有的觀念，本來是很苦痛的事，但爲了眞理，一切犧牲都該忍受。有許多人往往因爲先發表或構成了一種意見，以後卽使發現有相反的證據，也不肯改正，這應該認爲是不道德的行爲。有許多人因爲某種目的，不惜抹殺或歪曲客觀證據，故作違心之論，那就不僅違反學術道德，簡直連人格都發生問題了——這是就律己方面說。

第二，學術是最不勢利的，所以研究的人也要屏絕勢利，只求眞理。不論是老師、尊長、名人、或顯要的意見，如果與眞理衝突，那也只好捨前者而取眞理。卽使是父親也並不例外。清代的樸學家是有此精神的。他們在討論學問時會說：「家大人曰：……按家大人之說非也。」如果他父親也是個忠實的學術工作者，他應該慶幸有此跨竈之子。爲了眞理，有時應該承認和自己反對的學派的主張。有時也應該犧牲自己所崇拜的人的意見。在學術範圍之內，只有眞理，只有是非，沒有權貴，也沒有寃親，違背了這個原則，也是不道德——這是就對人方面說。

第三，研究學問雖不講勢利，不講情面，却要有點風度，有點雅量。學術上的意見不妨各異，受人批評也是常事，但不必，亦不可，牽涉到感情上去。有許多，本來是很好的朋友，或雖非朋友，却也非仇敵，往往因爲學術上意見不同，寖假而成爲仇敵；甚至由學術上的仇敵，而變成政治上的仇敵，這是最不幸的事。這都由於缺乏風度與雅量。古代印度有一

種公開辯論學問的制度，約論雙方立下條約，請好證人，如果輸了，把自己的腦袋割給對方。玄奘在印度那爛陀寺時曾接受過這樣的一次挑戰，對方是六派外道勝論大師順世，結果玄奘辯勝了，外道順世便要履行條約，但玄奘不許他自殺，於是順世請玄奘收他為奴僕，玄奘又不許，他又請玄奘為師，這才許了，但同時又向順世請教，向他學習六派外道的理論。印度對於探討真理的過分認真固然令人駭異，但玄奘的大度，雅量與虛心無當更令人起敬。目前朝野許多愛談名理的人物，如果他們能有較高的風度與雅量，我想可以避免許多不幸事件；對於國家前途，一定有很大的好處。

第四，研究學問要對自己忠實，最忌取巧。例如自然科學的第一課是計量，假使一個學生初進物理試驗室，用精密儀器量一個圓柱形的體積，規定量二十次直徑，求得一個平均數，這平均數也許會與只量一次是相同的；聰明的人也許覺得量二十次真是愚蠢，但二十次的平均數是正確的科學的。量一次所得的數字也許也是正確的，但是不科學的，偶然的。一個取巧的學生如果只量一次，還自以為聰明省事，便是違反了學術道德的信條。自然科學如此，其他社會科學的統計報告，人文科學的調查記錄，也莫不如此。一個統計數字的錯誤，一節調查報告的失實，可以影響到政府的施政方針，甚至影響到國計民生。一個人的學術工作是不一定有人監督的，所以要全靠對自己忠實。中國的哲人也教導人：「君子慎獨」，此語本意雖指倫理道德，我們今日却要把它應用在探求真理的學術道德方面。

學術工作是國際的賽跑，我們過去落伍的原因是物質與精神的憑藉都不夠。物質條件可

以借助於人，精神憑藉却非靠自己不可。憑我們今日的學術標準、道德標準能否趕上別人？

四

上面所談，都是些迂闊而平凡的話，毫無驚人之語，也不能聳人聽聞。恐亦未必為青年讀者所喜。但我想真正關心中國前途而默察當前時勢的人，也許會覺得我這些話在這時候還有說說的必要　假使這樣平凡的話而居然還有說說的必要，這是應該令人悲哀的。但在這時代，悲哀也成了奢侈品，還是加入賽跑是正經。

論近十年的教育政策

建設一個國家，眞是經緯萬端，而一切工作，都要靠人來做，所以，造就人才是一切的根本。眞正的人才要教育、培養、感化、陶冶出來，決不能「訓練」出來。眞正的人才，也不會甘心受「訓」的。所能訓練出來的，至多是技術人員，而技術人員也不能全靠訓練。否則便是些庸才。

建設的大業雖然千頭萬緒，但所需的人才總不外乎賢者與能者兩種。禮運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粗淺的說，賢者是計劃人才，能者是技術人才；賢者是政務官，能者是事務官；賢者是政府中的大員，能者是各部門的專家；賢者是社會各方的領導人士，能者是各階層的技工。在高等教育機構中，大學中，文法等科應該是培養賢者的部門，工農等科是培養能者的部門，理商等科則二者兼而有之；一個國家的教育政策，應該統籌兼顧。若以民國以來政治的汚濁而論，則目前中國需要賢者，比能者更爲迫切。若以今後建國大計而論，則技術人才不妨國際合作，借資客卿；而操持一國主權的政治、經濟、外交人才，代表一國文化水準的思想、文化、學術人才，決不能依賴友邦，靠人借箸，必須自己培植。這個道理明白簡單，無待詳述。

根據上述觀點，則五四以後自由主義的教育政策並無大誤，而抗戰以後竭力提倡技術科

目，抑止文法科目的大學教育和留學政策，實在嚴重錯誤。凡是詆毀戰前教育的，不是認識不清，便是別有作用，或二者兼而有之。戰前的教育是相當民主的。有的人看到抗戰初期的世界大勢，以爲民主政治要不得了，集權政治可以發揮最高效率，因此不免懷疑我國戰前的教育政策，想把它改成某種方式。也許當時有人眞心相信，中國需要某種教育政策，才能富強。現在證明了今後世界潮流，適者生存的還是民主政治。我們的教育，還是要配合這個潮流的　幾年以來的教育政策，有的大學根本沒有且不許設立文、法學院（其實沒有文法學院的大學只是技術學校 Technical College，根本不配稱大學），有文法學院的大學，又加以種種限制，如於招生及公費等。公費留學，幾乎全是技術部門，連純粹科學都不大獎勵，文、法學門更少得可憐。這種偏枯的政策，其根據不外兩點：第一，今後中國必須加速工業化，所以急需大量的技術人才；文、法科人才暫不需要。第二，中國文化本極深厚，所缺的只是現代實用科學，這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說的變相復活，這種似是而非的理論，對於建國前途大有妨礙，不能不辭而闢之。

第一，中國必須工業化，這是天經地義，絕無問題。但工業化的先決條件是要有科學基礎，並且要和政治能配合起來，這個國家的工業才能成爲福利而不是禍害，如果一個國家只顧工業化，而不想培養、因此缺乏、第一流的思想家，第一流的政治、外交、經濟人才，這個國家比沒有工業化更危險。殷鑒不遠，就在戰前的捷克。捷克的工業，尤其是國防工業之發達，軍械的精良，在戰前是數一數二的，英國決比不上。但是領導捷克的是哈柴一流人

物，可以在四十八小時內亡國，讓二十個納粹師團徒手開入，全部機械化了之後開出。她的重工業不但害了她自己，也害了整個的歐洲，納粹德國之所以能迅速掃蕩歐洲，捷克的工業幫了很大的忙。德國和日本都是以高度工業化見稱於世的強國，就是缺少有遠見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最後終不免敗亡。英國的張伯倫幾乎把國家弄亡，但邱吉爾終於急救了危局。戰後的英國仍極危險，而人民的教育程度使他們挑選了執行溫和的社會政策的工黨，使她逐漸恢復元氣，避免危機。反過來看，革命後的俄國既貧且弱，內外交煎，毫無工業基礎，但因爲有第一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兩個五年計劃把她變成一等強國。俄國是一個很適當的例子。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中，大部分的技術人員是客卿，其中美國人最多。技術人員請別國來幫忙是無損國格的，但是五年計劃的本身不能請美國人來代擬。一國的重要國策必須自己決定，則非自能己培養出來的人才不可。如一國教育專以訓練技術人員爲能事，如何能產生第一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又如：外蒙雖然獨立了，內蒙和西藏新疆等地，畢竟是構成中國的若干部分。這些部分儘管可以給予某種程度的自治，但總不能完全不問不聞。可是我們目前的大學中，有沒有開設蒙藏新疆語文的系科？有沒有開設學習蒙、藏、新疆、社會，宗教，風俗，禮制的課程？中國學生如欲學習這些學科，還須到別國的學校中去。事實上，中國境內的語、文、社會種種學科，中國人自己不明白，也不想明白，却要讓外國研究，向外國人學習。因爲這些是屬於文法學科的，不爲教育當局所重視，今後建國，工、礦、農、醫種種技術人才，我們可以

請客卿幫忙，國際間技術合作是並不可恥的，但是決定國家遊政大計乃至封疆大吏，則決不能請客卿代庖，也不能派不通言語，不諳邊情的大員去的。民初徐樹錚之「收復」外蒙，實種今日外蒙獨立之遠因。又如今後我國和俄 印、韓、緬、暹、越各國的關係自然要加強加密，我們對於他們的語文、歷史、社會、宗教、禮俗都知道得太少，造就這類人才的教育機關更是絕無僅有。這些都是以提倡實用科學為教育政策的自然結果。

第二，主張中國文化深厚，不必全盤西化，只須學得西洋的科學技術，便可富國強兵，這是張之洞輩「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老調。但張之洞在那時說這話是由於他所見不廣，智識不夠，是可以原諒的，今日許多留學生猶持此說，顯然是別有用意。姑不論立國於今日的世界，他們腦筋中的所謂「中學」，夠不夠為一國之體；即就問題本身而論，已極不通之能事。古今中外任何一種文化，決不能體用分開。有某種文化之體，才能產生這種文化之用；形而上的「道」或「體」，和形而下的「器」或「用」，有邏輯上的必然性，絕對不能分開。文化是整個的，不同文化的「體」「用」不但不能調和，而且會產生和預期相反的結果。作此論者如果對於西洋現代文化朦然無知，或者雖也明白可故作此語，阿附時論，志在獵官，則可存而不論。若除此以外別有用意，則未免謀國不忠。有人曾舉日本明治維新作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例證，也是強作解人。殊不知張之洞提倡這套理論時，郭嵩燾正從英國出使回來。郭氏曾指出日本派在英國的二百多留學生，其中有王子、諸侯，而所學多為彼邦的政治法制等經世之學，習船堅砲利者寥寥無幾。因此他結論道：「兵者，末也。」

「夷狄亦有二千餘年之文化道德」。而時論目郭氏爲大逆不道，交相奏劾。「兵者，末也」，驟看似嫌武斷，殊不知這正是郭氏的卓識。正惟他深知體用之不可分，要學西洋的船堅砲利，必須先學他們整個的文化學術，「船堅砲利」才能生根。否則是無根之草，無源之水，其枯其涸，可立而待。嚴復在英國學海軍，成績比伊藤博文好。伊藤回去中興日本，併吞朝鮮，而嚴復回來無所措手足。本位文化論者也許會引莊子的名言道：「能不龜手一也，或以霸，或不免於洴澼洸」。問題並不這樣簡單，嚴復回來無能爲力，正因爲他爲資格所限，不得不回籍去補應「鄉試」，而這正是中國本位文化的一部份，他受了苦痛的教訓以後，盡棄所學而專譯西洋的政論名著，而桐城派古文家却欣賞他的文體有先秦諸子之風。眞令人啼笑皆非。

現在不是有許多政府人員，他們在國內外學的都是工礦一類課程，回國以後却放棄本行，從事於文化、政治的工作麼？這種現象，在他們本身必有學非所用的苦痛，而客觀的事實正說明了國內文、法人才的如何不夠，致許多人才所受的技術教育變成了浪費。現在大批受鼓勵誘導而學習實科的青年，將來會不會也有這種現象？就在目前，抗戰以來工農學院畢業的學生，已有許多從事於與所學毫不相干的職業。我們希望教育部能把十年以來的大學畢業生作一個就業調查，看看各校的畢業生有百分之幾從事於本行的工作。

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政治問題。中國今後建國最需要而不能借貸盟邦的是文、法科的人才。三年之病，必須求七年之艾。中國的政治病現在是越來越嚴重了，如果再不從根本上

設法補救，則下一代的悲慘情形，這一代也許可以領略。本文祇就近十年來的教育政策略一檢討，此外尙有若干問題，當另爲文論之。

論重點教育和留學政策

今年（一九四七年）五月初，中央大學因爲經費困窘，復員工作頗受阻礙，不但教授全家五六口人只住一間房子，過着做飯、吃飯、睡覺、會客、編講義、看試卷都在一間房子裏的「單細胞」生活，並且圖書館、實驗室都無法修理、設備、開放。學校急得無法，召開全校最高組織的校務會議，商討此事。該會商討後舉了七個代表，和教授會的十餘代表，應張羣院長之約，同赴行政院商議，教育部朱部長也應邀列席。當時對於國家財政的分配，教育經費之少（只佔國家總預算百分之三點幾），曾熱烈討論。假使我沒有聽錯，我記得當時坐在主席地位的張院長，也認爲那樣的預算分配是極不合理的。問題在於立法院居然把它通過了，行政院無法更改。我曾以「試行責任內閣」之說，請張院長提請立法院復議修改，教育界全人願予支持。張院長於是說到他個人對於大學教育的意見，認爲大學教育應該鼓勵私人來辦，並舉英美各著名大學爲例，如哈佛大學基金之雄厚，中國沒有一個大學趕得上，而基金多由羅氏基金團所捐贈。他說今日中國政府實無力辦現有的這許多大學，勉強是辦不好的。因此他個人反對把私立大學改爲國立。朱部長也同意此種見解，他說，在他任內，只有一個南開改爲國立，而事實上南開自戰時加入西南聯大後，早已國立，他任內只改了個名義而已。當時沙學浚先生曾提出：要使中國的大學趕上國際水準，盡提高世界學術的義務，政府

必須就力之所及，先辦好幾個重要的大學，然後逐漸辦好全國所有的大學。他稱這個辦法為「重點教育」。這一意見，張院長、朱部長和在場的代表，都一致同意。我彷彿記得在重慶時就有人提出此項主張，是否卽係沙先生或別的人，則已記不淸。

不意最近胡適之先生在平發表談話，主張政府先努力辦好北大、淸華、浙大、武大、中大等五校，以五年為期，然後再推及其他五校，在原則上可謂與「重點教育」之說完全相符。至於那五個學校居先，若干年一期，每一期中各校次序的排列等等，倒是次要問題，儘可從設備、成績、地域、歷史、人事種種方面從容討論，用客觀的標準來平心靜氣的仔細釐定。這是一個奠定國家百年大計，從國防科學，人民生活，到世界學術，無不相關的重要問題，確乎值得大家討論。但討論的要點應從原則本身的是非着眼，不能因為次要步驟而滲雜一校一人的意氣，尤不能因此而牽涉到倡議者的治學方法等等。我想關心中國前途者對於此點應能同意。

我是贊成重點教育這一主張的，並且我深信有許多人贊成此說，不論其人所在之大學，是否為胡先生所列舉。胡先生所未列舉的大學，亦未必其教授人才和設備卽不如其所列舉者，因為戰時和戰後的教授流動性很大，設備的保存或損失亦不一。胡先生的談話發表於來南京出席聯合國遠東區基督教會議返平以後，且說明曾與蔣主席朱部長談過此事，或許也與教育界別的人士談起過。我不知道這是否僅係他一個人的意見，抑係許多人的共同結論。如係許多人的共同結論，這是值得大家嚴肅考慮的一個大問題。胡先生的談話發表以後，報載

前中山大學校長鄒海濱先生和南開大學的陳序經先生曾有討論，鄒先生的意見我可惜未能見到。陳先生的意見則在九月二十一日上海大公報上看到他的「與胡適之先生論教育」一文，但可惜他躲開重點教育的原則不談，只就一些次要問題着眼，不滿意胡先生的「隨便推薦」，恨他「不公平」，因此要他「拿證據來」，批評他不了解十年來國內大學情形。即使陳先生對於胡先生的批評是百分之百的準確，但是因此而撇開重點教育的原則，（是否即用「重點教育」這名稱是沒有關係的，但大意如此，不必以辭害意，）也不免犯了「以人廢言」之病了。

在原則上，我認爲無論今日政府的財力不可能把全國一百七十多個大學學院和專校辦好，即使今日國內太平，外匯充裕，圖書儀器恣我採購，一個教育部中的部次長和高教司的人力，中國今日高等教育界的人才，能否把全國一百七十多個大學、院校（教會和私立的大學、院、校尙不在內），一起辦得夠上國際標準，也是一個分明得如黑白的問題。若明知今日的財力人力都不足以辦好一百七十多個大學、院、校，因此就不想把較有基礎的少數大學辦好，不讓他們「偏好」，要壞大家壞，要經費不足大家不足；這種思想，「公平」則公平矣，但爲中國教育學術的前途計，實非善策。當然，重點教育的意義，並不是說只要辦好若干大學，其餘的任他不死不活。教育經費之應該普遍提高是另一問題，此點並無爭論。但要使中國的大學趕上國際標準，既不是一蹴可幾，自不免有輕重緩急。承認今日財力人力之不能使一百七十餘大學、院、校一蹴而達國際標準，而又要公平，則惟有抽籤。但把有數十年歷史的大學，與成立不久、設備簡陋的大學一起抽籤，是否合理？是否就算公平了？學術

平等的意義，應該使歐幾利德成為歐幾利德，愛因斯坦成為愛因斯坦，達爾文成為達爾文，赫胥黎成為赫胥黎。歐幾利德不可能懂相對論，愛因斯坦也趕不上做幾何學的開山祖師。達爾文沒有赫胥黎的文才，赫胥黎沒有達爾文的專精。但是各有千秋，不必因為任爭虛名而抱怨上帝和環境條件給對方以「偏私」。並且重點教育的目的，在逐漸使所有大學、院、校都辦好，而不是永遠置重點於某幾個大學。所以我說，重要的是原則，那些校居先，若干年一期等等都是次要的。

至於學校的質和量的問題，我以為與重點教育並不衝突。近年專科以上學校單位之增加，我也認為是中國教育的進步，而且這進步是必然的，應該的。第一，近年中學畢業生突然增多，如果沒有多量學校供其升學，自是阻礙人才之發展。第二，中學生既然多了，優秀的學生，有能力升學的學生也比例的增加，所以許多老大學不能不擴充院系名額以容納這些有志的青年，也是應該的。第三，抗戰以前，陝西、甘肅、新疆、貴州等省，均沒有大學，甚至沒有學院，現在有了大學，至少有了學院，對於這些貧瘠而交通不便省份的青年，自然是需要的，有益的。這些大學設備人才當然不夠，但比根本沒有要好些。這些大學，當然增加了中國教育之「量」，但不必妨害別的大學之「質」。重點教育實行起來，他們也會逐漸被提高到夠上國際標準。中國教育量的增加是應該稱道的，值得稱道的，只求量的增加而不求所以逐漸提高其質是應該反對的，這兩種見解並不矛盾。所以要提倡重點教育。

因為重點教育，談到圖書設備，因為教部外匯缺乏，不夠各校向國外採購設備，談到留

學政策所耗外匯，這是就事論事。凡就事論事，不必即是承認題外一切現象均是合理的。若必欲因此牽涉到國家別的地方浪費外匯。沒有誰說那種浪費是應該的。胡先生倘能指出馮玉祥、李漢魂、資委會等人和機關來，能舉出數目來，陳先生則只舉幾個美國酒店招牌，不敢舉出人來。其實這樣舉也是掛一漏萬，陳先生敢指出戰爭所耗的外匯數字嗎？然則，無已，姑且就事論事，則我也認爲留學所耗外匯，不如移作充實國內大學之用，陳先生認爲國內大學即使有了圖書儀器，也趕不上人家，必須要到外國去，否則便是曾國藩的思想。這眞「未免把這事看得太容易了」。（這是一個中國現代化的問題，我已另有專論，茲不贅）。

第一、即使自然科學方面的研究，在外國學好了，譬如錢三強先生夫婦，發明了原子分解的新方法，如果國內大學研究院無此設備，回到國內，英雄無用武之地，再過幾年外國更有新方法，他便落伍了。如此則只好長久在外國，使中國學術界得不到一點沾溉，中國科學界前輩中回國後抱「英雄無用武之地」之恨者，比比皆是。可見不求重點教育，不充實國內大學，留學政策不僅是外匯的浪費，也是人才的浪費。

第二、如果中國大學或學術機關設備好，經費足，人才夠，不必去留學，自然科學也可以發明，（人文科學尤其如此）。戰前中國在地質學上的貢獻，北京人的發現，都是在中國自己土地上工作出來的成績。

第三、重點教育的意義，不僅限於充實圖書儀器，也可以請外國學者來教，不一定要出國去就讀。過去有許多例子，證明外國學者並非不願來中國，也不一定請不到。圖書儀器等

設備是對於學者最大的引誘。如果國內有些大學，其教授、圖書、儀器、材料、經費　精神、訓練和外國大學一樣好，我想不出中國青年爲什麼在中國這個大學則爲曾國藩或康有爲，在外國那個大學則爲胡適之或陳序經。

第四、我倒覺得留學政策對於許多青年並不完全是好的。有一個青年朋友對我說，「出國是和出天花一樣，總得出一次」。有人完全當作獵官的工具，有人完全爲去享受，有很多人把它作爲履歷片上的裝飾，有的女子作爲妝奩，近來索性有人作爲發財之道，因爲可以帶些古玩、玉器、珠寶、絲繡出去，換些小郵包寄回來托親戚放比期。而其回來可以養成虛驕之習則同。我遇見許多留學生，除了會說"When I was in America......"以外，不會說一句完全的英語句子。讀學位，碩士也許不如博士，而博士則往往不如學士，除非他也有學士學位。因爲外國大學本科的訓練相當嚴格，畢業院的訓練，尤其對中國學生，不一定比中國有歷史的大學更好。我也不否認留學生中有不少眞才實學之士，但以全體而論，此中得失是值得計較的。我覺得清末民初留學的人平均成績反比後來的好，抗戰時期和現在出國的都存一些逃避現實，出去享受的念頭。以後是否應該繼續、是值得考慮的。

留學政策在開始的時候，卽清末民初，是對的。抗戰時期卽被美國人譏諷過：「我們大學中的青年跑到你們中國內地作戰，你們自己却來塡補我們大學的空額。」以後再要無考慮的繼續下去，鬆懈了提高國內大學的努力，則中國的學術將永遠殖民地化，永遠不能擺脫依賴性，永遠做人家的附庸而不能獨立自強，使中國的大學，永遠居於外國大學的預備學校地

位，遑論對於世界學術有所貢獻！

由上所說，可見假使國內大學的設備充足，圖書完備，連自然科學都可以獨立研究，何至於研究水經注的版本，要到美國去呢？如果今天再不注意重點教育，一味依賴外國大學來教育我們的留學生，不但中國的自然科學無法進步，連「漢學」都要到外國去學，這還成何話說？須知外國的漢學家，像法國的伯希和，英國的翟理斯，瑞典的高本漢，美國的顧理雅之，都是在中國學成了才回到他們本國去名家的。（因爲彼時外國大學還沒有收藏中國書）。留學政策和重點教育的孰輕孰重，何去何從，卽使從水經注的版本上，也可以悟出來的。

現代國家的道德基礎

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朝代開國之後，放下武器，必談道德。所謂「偃武修文」，意思是說，混亂時期一過去，統治階級必須來談仁義，說忠孝，講詩書，習禮樂。正因為用武的時期是不能管那一套迂腐的辦法的。那時候要尚權詐，計利害，不怕殘酷，不恥機心。姦淫擄掠，在所不避。如果在兵爭時講仁愛，常被人笑為無能，所以劉邦不辭吃父親的肉羹，宋襄公永遠是譏諷的對象。但一到打得精疲力盡，大勢略定，便要「修文」了。修文不必是讀書，「文」是「文治」，所謂「馬上得天下」，不能於馬上治之，於是乎農業經濟的封建社會的那一套「文」，就被搬出來作為「治」具了。這一套「文」之所以常常是儒家的忠孝仁義，而不是墨家的兼愛、非攻、尚同、非葬，也不是法家的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可憐法家還不敢說國王犯法……，那是被農業社會所決定的），正因為儒家以柔順為德，是亡國大夫尚全性命的哲學，（用胡適之先生「說儒」的說法）。是最合乎統治階級的胃口，最適於他們作為「治」具的一套給被治者遵守的道德。所以司馬光寫歷史，直稱「資治通鑑」。用現代的話翻出來是：「給統治者看的鏡子」。有了儒家以後，二千多年中國的社會經濟組織沒有變更，所以每次易代以後，儘管政制、軍制有些變動，而維繫社會組織的道德標準却始終未變，每一個王朝將臨崩潰，儘管有其經濟的政治的原因，必可先見一般社會道德的墮落，在西洋則稱

爲世紀末的墮落，繼之以社會結構的動搖與混亂，野心家出來爭政權。在道德崩潰和大破壞以後，取得政權的只要稍稍給人民一點安定，他們是很願意遵守那些作爲治具的道德的。

但是近百年來，中國的情形被逼得非改變不可了。海通以後，都市的，工業的，科學的，民主政治的文明傳入中國，儘管你以五千年文明古國的資格說他們科學利器是「奇技淫巧，玩物喪志」，說他們的政治制度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甚至於還會妄自尊大的說，「夷狄之進於中國者，則中國之……」但結果是夷狄不仁，以中國爲芻狗，爲殖民地，爲次殖民地，爲傾銷市場，爲原料掠奪所，爲國際戰爭的戰場（如日俄之戰）。總之，中國素以外國爲夷狄，而現在則夷狄竟自以爲文明國家，而以中國爲野蠻民族。形勢恰恰顛倒過來，使許多色盲的愛國之士生則切齒，死不瞑目。前清的中興名臣胡林翼看見長江中的汽輪排浪前進，急得吐血。這雖是上一世紀的故事，而現在也仍有若干大員同具此感。不過胡林翼所見者爲輪船，今日的「愛國之士」所見者爲政治經濟的制度罷了。自從胡林翼以來，中國也未嘗沒有眼光遠大，虛懷學習的人士。無奈許多人背這五千年「精神文明」的十字架，總覺得中國的道德是全世界最高尚的。既希望建立現代化的工業化的富強國家，又捨不得半封建的、農業社會的道德遺產，而且相信這份遺產也可以使中國現代化，這眞是不可思議之事。

我在這裏並不是要批評中國舊道德的好壞問題，道德本身是隨時而異，隨地而異，無所謂好壞的。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廿八年夏我到蘭州，那時甘肅各地正在推行「一元獻機運

動」。因此海貽寶先生講起一個故事。他說他曾到夏河縣（拉卜楞）考察，當地的古風，女子是不穿褲子的，後來東方人（指沿海的人）去了，夏河的年青女子學摩登，也穿起三角褲、絲襪來了，於是地方上的紳士們認爲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爲維持風化起見，繼「一元獻機運動」之後，他們發起了「脫褲子運動」。我們不要以爲這是笑話，夏河的紳士們是在認眞嚴肅地維持固有道德。道德本身之無絕對標準可言，往往如此。即使是大家公認的一種道德，譬如說，「仁義」，究竟那一種人算合乎這種道德呢？古代的聰明人早已說過：「侯之門，仁義存」。而在「侯」這個階級裏，齊桓、晉文算是頭兒腦頂兒尖兒的人物了；然而仲尼之徒，却羞道桓、文之事。所以莊子以爲大盜竊國，連仁義一起竊了去。無怪柳下惠的兄弟的遺囑，要在棺材裏放一個大鐵椎，他要化爲厲鬼，「擊三皇五帝於地下」。使革命的前輩章絳，嘆爲「儒俠」，正因爲這些皇帝們或彼人假托的皇帝們假借仁義，殘民利己。仁義尙且如此，則其他許多中聽好看的字樣，自然也大抵相彷。可見道德本身無所謂好壞，只在看它是否合乎一定的時間空間的適用。若被人假借利用，損人便己，則只有壞處。

然則中國以前的道德標準是否適用於今日的情勢呢？換句話說，半封建的、農業社會的道德標準，是否可以作爲建設現代化國家的憑藉呢？如果我們拚命抱住這些道德柱子，我們的客觀環境，排山倒海而來的現代潮流，會不會把我們連人帶柱一起沖倒呢？我們現在所要抱住的柱子，是否還有內容，還是早已給社會各階層的腐化分子蠶空了，只剩下一個空殼子呢？這些問題，都是關心中國前途的人所應該嚴肅考慮的。

從後面的問題說起，我們無須諱言，中國在今天正是一個道德崩潰的時代。這裏所指的崩潰，大抵是指舊道德，因爲新道德尙未建立。貪汚是中國有史以來所痛恨的，然而今日人民被掊得這樣窮，却要待外國的欽差大人來指摘，才稍爲有一點改革的姿態，在欽差大人未指摘以前，因熟視人民的水深火熱，而放縱貪汚如故也。有此一端，還談什麼禮義廉恥？而今日政治上的腐敗，固又人人皆知不止此一端也。試問今日我們所抱住以抵抗外來道德的柱子，除了一層空殼以外，還剩下些什麼沒有？再說效率，那正是現代工業文明中的最大道德力，這是「精神文明」的經典中所沒有的。我們的理想社會是三皇代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效率於我何有哉！我們的實際社會是農業爲主，寒來暑往，秋收冬藏，靠天吃飯，聽官要糧。我們社會結構是家族本位，一人作官，闔族沾光，一朝在官，終生受用。而作官的要訣，以前只有「吹」「拍」「騙」，現在却多了「推」「拖」「瞞」。而文告之美，宣傳之工，統制之密，却又迥非前人所可幾及。而我們所處的環境，却是夾在祕密武器層出不窮，隨時可以被人毀滅的強大集團之間。

我們的固有道德，從字面上看來是無可非議的。但是由於社會組織之亟待改變或已經改變，其內容也早已變質得不切實際，即使大家遵守，也已經只剩下一個空殼子了。譬如說孝，曾子的以養志事親固然因二代之間可能的思想矛盾而辦不到，即如曾晳的以「養體」事親，在工業社會裏也早已大成問題，再加今日士大夫階級生活之艱難，事實已陷於不可能。農業社會的經濟生活是空閒時期幾與工作時期相等，勞力賤而生計薄，人口爲土地所吸住，

家族觀念因之發達。政治遠沒有天氣重要，人生唯一的大目標幾乎只爲維持家族生存，對於家族和近隣以外的社會和國家是根本無所用其關心，也沒有興趣去顧問。農業社會中的工作是個人和家族的事，與國家無關。中國人素來重情誼，情就是切身關係。陶淵明所謂「樂親戚之情話」，情話的內容是桑麻日長，兒女成行之類。佛教中所謂「有情」，即是說「關心的人們」。除非在亂世，政治和他們的關係太少了。直到現在，許多還在津津樂道的「朱柏廬先生治家格言」，其中說到一般人和政治有關的只有一句話，就是趕快納稅，免得躭心。政府對於他們有什麼好處，他們很少嘗到，也懶得去想他。

這套思想，只問本人與親戚朋友間的情誼，而不顧社會國家的利益，直到現在還是如此。現在大家詬病政治上腐敗貪污，社會上許多人不顧公德，損人利己，但是人與人之間尙可相處，就靠這一點舊道德的殘餘，即對公家可以不守道德，對於自己所認得的人却還有點友誼乃至道義，不好意思拉下臉來侵害親朋友。例如一個人住在公家的房子裏，即使晚上出去了，也懶得關熄電燈，如果住在朋友家裏，他是會記得關燈的，否則必爲知者所指責。其實說穿了也只是自私而已，因爲親戚朋友有可以互相幫助之處，換句話說，是在互相利用之下來維持這些友誼或道義的。這一點舊道德的殘餘，目前的社會雖靠它暫時維繫，政治却因此而腐敗貪污。而此種腐敗貪污繼續下去，社會的維繫也終於會被它切斷而崩潰。事實上，這種情形已經開始了。

舊道德的殘餘既然已演變到自私的地步，而西洋文明社會中的新道德又沒有建立起來，

這個社會的基礎已在動搖，如何談得到建設現代化的工業國家？在美國，兒子做大學校長而父親在學校裏做門房是不以爲可恥，如果這個老頭子不能自食其力而要靠兒子養着，他反覺得損他的自尊心，但在中國，這樣不孝的兒子必爲社會所不齒，兒子結婚以後在父親家裏吃飯要算飯錢，也必被人目爲不近人情，由此也可以見得中國只有人情而沒有權利義務的觀念，而這個觀念是西洋文明中最重要的道德標準。西洋人的道德觀念是建立在理智上，中國人是建立在人情上的。除了理智觀念以外，西洋人也講人道，例如對兒童不用體罰，對囚犯不用肉刑，對虜俘乃至牲畜不許虐待，中國則到現在父母打子女，教師打小學生乃至中學生，官長打士兵，虐待壯丁更是題中應有之義。理智觀念和人道觀念尙未培養，如何談得到人權觀念？如何能建立現代化的民主國家？

上面所說的西洋國家大抵是指英美諸國而言，現在的社會主義國家則又另有一套道德標準。例如蘇聯在保衞史太林格勒之戰役中，把壯丁留下，發給他們武器和糧食，以便抵抗敵人，把婦孺設法運走；却不管老弱殘廢。這在中國人看來是不道德，在英美人看來是不人道，但是爲了要戰爭勝利，蘇聯的辦法是理智的。在作戰期內，中國人常以兵士死得多爲勇敢光榮，報上用大標題「我軍壯烈犧牲」，「全部光榮殉職」，在英美人看來，一個國家不能用武器制勝，而使大批士兵死亡是可恥的，光榮應與死亡數成反比率。在平時，社會主義國家是只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物資，而踢開你們這一套傳統的倫理和道德的。這在英美看來必以爲大不道德，然而社會主義國家則認定只要人人有飯吃是最大的道德，其餘一切倫理道德

要看是否合此「大家有飯吃」的標準，否則即是不道德。這許多新的道德標準，及賴以建立此標準的若干觀念，也正是中國走向現代化時所應學習培養的。

我們現在常常埋怨人民道德太差，譬如抗戰時期後方常常翻車，如果在外國則必先救人，在內地則士人往往把受難者的財物搶去，搶物當然不對，但這些士人終年不得一飽，看見翻車可以發點財，他們爲什麽要放棄機會？從前中國的政治家說：「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現代外國的社會學家說，這種現象是由於「饑餓心理」而來。「天地之大德曰生」，求生是天經地義的。拿「道德」來責備生存無保障的人，這種責備本身就無道德價值。我們要培養中國人民的現代道德，先得收起舊的那一套好聽的名詞，做到「倉廩實」「衣食足」，然後再培養現代國家的若干觀念，作爲建立新道德的繩準。沒有現代工業文明的新道德是建立不起工業化的國家來的。中國目前的工作雖是千頭萬緒，而使人民倉廩實，衣食足，奠定新道德的基礎却是起碼的先决條件。不此之圖而空喊恢復固有道德，吾雖未能逆睹其成敗，然其不能藉此以建立現代國家，則大致是無疑問的。

論存儲反應

一

以前有人講笑話，說三十年前的小孩子作文，教師還沒有出題目，學生已經在紙上寫好了第一句「人生在世」或「爲人之道」。較高的年級，任何文章都可以用「嗚呼」開頭。自從小學的課本改爲白話以後，這一類萬金油式的套語不再出現，因爲小孩子腦筋中不再堆積這一類材料了。但也有一時期，不論名人講演，雜誌論文，學生作文，經常以「自從五四運動以來……」開頭。抗戰時期，我在後方各地教書，每年暑假要看幾百本入學試卷，開始幾年，所見卷子的第一句話幾乎千篇一律的是「自從蘆溝橋事變以來，」這是文言白話都適用的起句；或者是「蘆溝橋的砲聲響了」！這是白話文的引子；或者是「時代的巨輪不斷地前進着……」這是受了所謂「社會科學」文字的影響。抗戰末期的文卷，則「蘆溝橋」告退而「珍珠港」或「太平洋」代興，「自從太平洋事變以來」又流行一時。另外有些「夫××爲××之本」之類，和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交織成文」。這種「之本」論，當然要歸功於中央訓練團之念茲在茲。去年暑假我又看一批招生試卷，題目是「釣魚」，我發現平均有百分之二十的考生，都有「一個未婚的叔叔，常常帶我去釣魚」。因爲這些考生都讀過某一篇英文的翻譯。今年一批試卷的一個題目是「孔子言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

聞斯亦不足畏也已」試申其說」。除了有些考生根本看不懂以外，看懂題目的考生，有百分之四十說來說去是「青年是國家的棟樑，社會的精華，」一些話頭。這決不是互相抄襲，以致雷同，因為這些卷子來自不同的試場，有的也說明這兩句話的出處，是某要人的講演之類。我舉這些例子，並無意思要譏笑這些考生，而因為這裏面有一些重要的問題，最明顯的是教育問題，大一點也可以說到國家問題。

這些現象，其實也並不限於學校中的青年。官場中黨團中的中年，也並不例外。所以從前吳稚暉先生有「黨八股」「洋八股」「土八股」之說，後來順理成章，自然會有「抗戰八股」。中國人稱為「八股」，因為這些文字千篇一律，陳陳相因，了無新義。但稱之為八股，也並未說出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而今之青年，也已很少知道八股為何物了。只有在官場黨團中的中年，作某種八股，也許明知可厭，而為了生活問題，不能不阿附上司，作此濫調。這也可以解釋「口頭禪」「敲門磚」這些名稱的來源。但是青年有此現象，卻不能不說是中等教育的一部份失敗。誰使青年的思想「凍結」，文字表達能力構成定型？中國目前能受中等教育的孩子並不多，如果這些人的思想都凍結了，這個族民的前途大可憂慮。如果青年思想凍結，是受教師的陶冶，而教師之所以如此陶冶學生，乃是有所秉承，則中國教育的前途更為可怕了。

二

但我希望上面的推論不準確，而用別種方法解釋這種現象。

英國的一個作家曾經說過：「第一個用花來比美人的是天才，第二個用花比美人的是庸才，第三個用花來比美人的是蠢才」。因爲他不肯運用思想而只知抄襲別人的說法。新文化運動時胡適之先生要打倒舊文學，建設新文學，就是因爲舊文學中現成而不用費腦筋的話太多，要做詩，那些「夕陽」、「芳草」、「垂楊」、「秋風」，推不開扔不掉地擠攏來。要做小說，照例是紅樓夢中賈母所謂男的都是子建，女的都是文君，千篇一律，千人一腔。這些都是不用費腦筋，只要把預先堆積在腦中的現成材料，搬出來就是，並不考慮這些現成材料能否代表他所要傳達出來的思想或情感，甚至不問這些材料和他的思想情感有無關係。現代西洋心理學派的文藝批評家對於這種現象下一個名詞叫作 Stock response ，這個名詞我姑且譯作「存儲反應」。

存儲反應和抄襲不同。抄襲有時是低能，有時是欺騙，或二者兼而有之。第三個用花來比美人的人，如果他根本沒有聽見過前二人的說法，我們不能說他蠢才。惟其因爲這是爛熟的比喻，他不會想或不肯想別的說法，而又須形容美人，只好照抄，所以蠢。在這種情形之下，抄襲是被動的，存儲反應卻是主動的，與抄襲有一共同點是懶於思考。一個人腦中堆積了若干材料，有一些是他最熟悉的，其所以熟悉，或者是因爲他特別喜歡，特別得意，或者是因爲他時常碰到別人也用。一有「機會」，他立即把最熟悉的材料順手牽羊地搬出來，有時竟與這個「機會」（照心理學上說法應該是「刺激」）「無關；有時他搬出來時也經過選擇，自以爲是最合適的（因此也是他最得意的）反應；而實際上是最平庸最陳腐最俗濫的。

一切八股——黨、洋、土、抗戰……之來源，都可以用存儲反應來解釋。

構成存儲反應的條件，除了懶於思考以外，個人的才智與學力也是主要的。而學力又爲環境所限。學力的限制，成爲思想的貧乏。如果一個中學生除了課本以外，所讀的只是大禮堂中挂的「守則」，和報上要人們的三等秘書所擬的講詞，則除非天才，他不能有創造的思考(Creative thinking)。他腦中只存這些貨，你要他搬出別的來是苛求。才智高的人，選擇能力也高，也知道藏拙，知道避免陳腐俗濫的反應。甚至在存儲的過程中，已加選擇，有所揚棄。

當然，存儲本身這件事情並不壞，人類的知識本來就靠堆積存儲而來。反應之必得從存儲(Stock)之中出來，也是無可奈何之事。問題在於反應時不能不思考當時的環境，對象及其所反應之事。而反應本身，或爲語言文字，或爲造型藝術 (Plastic Arts) ，或爲人事態度，必須審度當時的環境，對象，及其所反應之事，而就存儲堆積的材料中加以選擇，配合和再造，（這其實就是創造過程），使它成爲最合適的。如果對於一個刺激，只是順手牽羊的搬出一些現成材料來反應，便是存儲反應。

三

但如果說存儲反應的人都是才智不高或學力不夠，也是不公平的。也有人才智學力並不在平均之下，却因爲有某種心理疙瘩(Complex)，也可以造成另一種存儲反應。暴發戶愛買字畫古書，陳設在客廳裏，表示他有文化教養，正因爲他有文化的自卑疙瘩，所以造了一種

自傲或優越疙瘩，存儲在心中，常常要反應出來。讀了一兩句舊書的，常常愛搬出來，賣弄他的「國學」，並無內容的文章偏要學古書的調子，嵌些古體字進去，「以艱深文其淺陋。」到外國跑過一趟的，講演時總不忘記表示身份：“when I was in America……”。下野的軍閥喜歡念佛，臨碑帖，刊點經書，表示他不但心腸好，而且也有點文化，在營裏受虐待的士兵，一出來遇見老百姓，便凶威十足，開口「老子」，閉口「混蛋」。理髮匠和廚子愛自稱「理髮師」和「廚師」。這些現象的本身只是心理上的補償作用（Compensation），這種補償材料堆積得久了，也會變成存儲反應，一觸即發，不能自制。

也有人因爲要替天行道，傳道，衞道，播道，自己腦筋中有一套思想或觀念，（其來源不論由於受了訓練，或由於自我孵育，其爲存儲則一。）「以爲天下之美盡在己，」心腸好的，想傳授別人，優越疙瘩特別發達的想統制別人，自己被那種思想範圍住了，束縛住了，而不自知其可憐，却要傳教衞道，流傳謬種，或拖人下水。人類有許多宗教上政治上的悲劇慘象，可能是由此發生的。若干宗教和政治人物鑽進了牛角尖，變成神經失常。希特勒之流的好戰分子明知戰爭終於要毀滅自己，而仍瘋狂的進行戰爭者，正因爲某種特殊的存儲反應佔據了他，迷住了他，對於許多政治上的問題不能有別的反應，變成瘋狂狀態，無以自拔故也。我想，許多瘋人常常反覆着某種言語或動作，其原因大概由於受了刺激以後，某種反應不能自由表達，被抑壓在下意識中，神經失常以後，這些存儲着的反應便不問是否在適當情況之下，隨時反應出來，變成了某種反覆的言語或動作。強烈的存儲反應不必爲造成宗教

上，政治上，或人事上半瘋狂或瘋狂狀態的主要原因；但在半瘋狂或瘋狂狀態的過程中，存儲反應無疑的是一種重要現象。不過一般地說來，存儲反應通常是指一個人在神經正常的狀態下的行爲。上文所指由於心理疙瘩所引起的，也不能算是神經失常的。

存儲反應的存在，其故有時不在作此反應者，而在他的對象的要求。例如有些黨八股官、八股，是作者的上司要他這樣做，他所處的環境只許他這樣做，他才這樣做的。這是比較特殊的情形。但久而久之，特殊也變成通常了。有時則因爲不僅作者，連讀者也懶得用思考，只要看些用現成材料湊成的東西，正因爲作者來得「順手」，所以讀者看得「順眼」。看自己看慣了的東西抵抗力小些，比較省力。省力有時被認爲痛快，所以也有人叫好。這可以解釋許多現象：舊時文人看熟了典故，因此作者也喜歡用典。彷彿家鄉的橋名，說出來你我均知，自有親切之感。（這裏還有一個聯想問題，茲不討論）。「平平仄仄平平仄」的調子，哼了上千年，還有人要哼，正因爲還有讀者要看。武俠、偵探、鴛鴦蝴蝶派的小說，還有人依樣葫蘆的在做，也因爲社會上自有一班人專看這些小說而不看新文藝作品。這些讀者們也已經存儲了許多這類材料，看新東西反應起來要費腦筋，不如看同類的來得「痛快」。「等因」，「奉此」的公文所以永遠不能改革，我想，存儲反應也是一個主要原因。

在這裏面，也包含一個中國能否接受現代文明的問題。

四

一個人有存儲反應，許多人合起來的民族國家自然也有集體的存儲反應。一個歷史長久

的國家，文化材料堆積得很多，歷史教育變成了這些材料的反覆敍述，人民腦筋中裝滿了這些材料，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傳統，傳統本身變成人民的驕傲與自負，這便是構成民族保守性的主要原因之一。保守性本身便是存儲材料的堆積，保守的民族常拒絕新的東西，認為他們所保守的最好，所以不願用別的東西代替它，認為他們所保守的最得意，所以常常要反應出來，向別人誇耀。中國人稱贊一個人對於某事或某書熟悉，常用一個比喻：「如數家珍。」相反的則用：「數典忘祖」，可見「家珍」和「祖」，被認為每人應該「存儲」的材料，如能「反應」則為人所譽，忘記了則為人所譏。中國這個民族並不反對存儲反應，從這兩個比喻中充分表現了出來。

保守者在新的環境中，遇見新的事情，不願接受新的原則，採用新的方法，自有他們可驕傲的老法子來應付。在這一個意義上，存儲反應阻礙了進步。一個民族的文化遺產，應該增加這個民族的智慧；遺產愈多，智慧的增加也該愈多愈精。但如果這些文化遺產已經和新來的環境脫了節，而它所增加於這個民族的不是智識而是存儲反應的習慣：保守、固執、偏見和對新事理的峻拒，則這些文化遺產對於這個民族，反而變成沉重的十字架了。

不幸今日的中國，正處在類似這樣一個情況之中。過去的歷史太悠久，文化太豐富了，使每一個中國人都有一分驕傲；近百年來新出現的環境太突然，新來的事理太可怕，太「不合國情」了。但是正因為存儲的材料太多，反應也就不能出此範圍，不肯承認「西夷」也有文化。及至新的現實越來越可怕，越不可抵抗，而存儲反應依然在作祟，於是想了個調和辦

法，叫作「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骨子裏仍不承認西學也有其體。等到調和辦法依然失效，這個民族的被侮辱與被損害成爲無可抵抗時，一種普通的自卑疙瘩佔有了這個民族，索性喪失了自信力，變成懼外媚外的心理。後來國民革命和抗戰稍稍恢復了一點自信力，培養了一點自尊心，於是數千年來的存儲反應又立刻作祟了，把「五四」所培養的一點現代國家的新基礎：民主政治，科學精神，自由主義，人權觀念，施以無情的打擊。打擊者戴着「特別國情」的帽子，穿着「正統」的法衣，挂起「衛道」的旗旛，捧着「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的神主，要替我們祖先的「固有文化」，做「張皇幽眇」的盛業。如果這個「固有文化」並沒有和這個民族所處的現實環境脫節，爲了這個盛業，我也願意執鞭隨蹬。如其不然，則這種存儲反應對於使中國爲現代國家這一件事情有利或有害，眞是無待蓍龜了。

一個小孩子不看清題旨而用存儲反應來敷衍一篇作文是可以原諒的，至少教育他的人也要分担一部分責任。少數人不能接受新文藝，喜歡一種用存儲反應寫成的文體，譬如有些家庭婦女愛看彈詞小說，也並無大害。但當一個民族不能認清它本身的現實環境，不能適應這個環境，而有意無意地用存儲反應來應付當前局面，甚至有人還想統制麻醉或迷惑別人，使別人也和他一樣只知道用存儲反應，則對於這個民族的心理衛生大有妨害，因之也妨害這個民族的進步與發展，甚或可以威脅其生存。

對於「固有文化」固然不能作爲存儲反應的法寶，對於外來的思想、制度、文化，也同樣的不能使它堆積成爲存儲反應的材料。其理由我想不必再複述。

眞正要使中國列於現代國家之林，不是靠盟軍打勝仗而躋列四強或五強，則中國人的自由思想，有鑑別力的思想，有選擇力的思想，能適應的思想，創造的思想（Creative thinking），是十分必要的前提；而這些思想，都是與存儲反應不相容的。

卅六年八月廿七日。南京

附錄　關於「軍與民的社會地位」

「觀察」一卷第九期載潘光旦先生「軍與民的社會地位」一文，從歷史和社會學方面，說出了許多一般人習焉不察的新見解，對於民主的理論大有裨益。講到民字古訓，潘先生說：

『民字古文從母，取蕃育的意思；這意思就不太好，好像除了蕃育的生物功能而外，老百姓就別無用處。這蕃育指的可能是蕃育人，也可能是蕃育畜產與農作物；如果是後者，則可見即在我們歷史的初期，民字雖指一般的人口，而特別適用的是農民了。……』

說文民字所附古文，其形體確有點像母字，但說文正文篆體却完全不像母字，而古文也只是「像」而已。許愼說篆體雖謂「從古文之象」，實則篆體古文兩者並不相像。而且許愼也沒有說古文「從母」。潘先生所謂「從母」的古文，據徐鍇說：「上爲髻形，（按：古代髻爲男女通有）。下其足行，象蒙然衣服之形」。也不說「從母」。實則徐說也不對，因爲象人體之字照例不加衣服。

甲骨文「人」字極多而「民」字少見。母字和女字甲骨文不分。甚至母女二字有時和尸字也可通假，下文「毓」「后」爲一字卽說明這種情形。但以我寡陋所知，母字與民字除了聲音相近之外，在形義上並無關係。金文齊侯鎛「民」字上半是橫形的眼睛；下半一直線，

中間有一點。其他的民字上半多像眼形，象公簋民字最與說文的篆體相近，故我以爲說文民字應以篆體爲是，古文不知所據。

因此，民字的原始意義，也不是蕃育，而人的蕃育與別的生物之蕃育，古代文字也頗有分別。人的蕃育有個專字，即毓，後來又演變出「后」和「育」二形。后和毓爲一字，是王國維的重要發明。郭沫若推衍其說，引古先公先王均稱后，而存世者則稱王而不稱后，以生毓（育）爲古代母氏最高的屬德，故后字爲母權時代女性酋長之稱謂。我以爲此說和王氏的發明同樣正確。我在這裏還可以補充一點意見，即古代凡有特別才能的人，即冠以有蕃育意義的后字，如善射者謂之「后羿」，善稼者謂之「后稷」。如此說來，蕃育的意思，在古代不但很好，而且特別被尊重。至於植物的蕃育特徵是帝（蒂）字，也沒有任何不好的含義，而是一個很有尊嚴的字。

至於民字的形義，撇開說文所附古文不說，從篆體以上推金字，則是一橫目之形。和民字相像而方位不同的是「臣」字。郭沫若以金文證明臣字象一豎目之形。人首俯則目豎，所以許愼說：「象屈服之形。」我以爲民是橫目之形。前人雖未說到，但莊子有「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一語，可爲我說佐證。臣是俘虜，是奴隸，故說文說：「牽也」，「臣」「牽」疊韻爲訓。章太炎引少儀「獻臣則左之」注「臣謂囚俘」，謂「此牽之而至也。」民是「衆氓」，雖然「蚩蚩」，倒是自由的，比臣要高一點。這雖然是原始的意義，但可見得從前稱臣的官吏，雖然可以作威作福，而其基本人格則反不如民。在正常的社會狀態之下，

民是不能被人「牽之而至」的。先秦處士——一種尚未做官之民族——之可貴，也就在此。雖然士和蚩蚩者氓地位不同，但詩經中士和女往往對舉，有時士也可作一般男子之通稱。又古書有「天聽自我民聽」之說，而從來沒有「天聽自我官聽」或「自我臣聽」之說，可見即使在古代，人民的意見也比官僚的意見更被尊重。

至於潘先生所引民字訓詁方面的解釋，如鄭康成、董仲舒、楊倞諸家注解，「冥也」、「瞑也」、「泯然無知」等，均以同聲相訓，却是漢以後經師的學風，在訓詁學上雖不能說不對，但這種觀念，我以爲和秦漢兩代的極端專制頗有關係。秦以前民的地位還沒有被看得這樣差。官之尊貴，也是從漢代起的。從前一國元首稱王，猶存人民領袖之意。漢代則稱「縣官」（例如張騫傳），「官家」（霍光傳），元首和官吏沆瀣一氣，遂和人民截然分成兩個階級，並且對立了。

由上所說，民字在古代的意義並無好惡褒貶之意，有時統治者故意降低人民的地位，則會在民字上面加些形容詞，例如細民，齊民，賤民，愚民，小民，庶民；有時索性避開民字，用黔首——顧炎武曾經嘆息過：「爲秦百姓皆黔首！」（這個「秦」當然是指清）。如果民字有不好的意思，嬴政何必更造黔首一詞？至於民和氓的區別，我以爲不在土著和流民，而是多數和單數。許慎說得好：「民，衆氓也」。若爲下一轉語，應該是：「氓，民之單稱也。」古書凡言民者無不指多數，如盤庚，「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酒誥「厥命罔顯於民」，「其惟民怨？」多方「誕作民主」。周語「防民之口」。論語「民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凡言氓者都是單數。詩衞風「氓蚩蚩者氓」，孟子「聞君行仁義之政……願受一廛而爲氓」。編氓之氓雖可說是多數，但編是逐個編的，故亦有個別之意。總之，古代的特殊有勢力者雖如潘先生所云，有時係「民」中特別提出來，但民始終是主體，是統治者的總稱。「民爲邦本」。

民字有一個時期特別少用，似與唐代避太宗諱有關。燉煌俗文學「季布駡陣詞文」凡用民者一律代以「人」，甚至四民亦改爲「四人」，「民爲邦本」改爲「人爲邦本」，此與後世稱賈人、軍人、工人、匠人或不無關係，因古書中賈、工、匠、等單文字義自足，軍人則分爲將、校、士、卒。「軍民人等」，似乎是以元代文告「諸色人等」一語套來的。

說到農與民之關係，則原始說明稱農之字是男，此字甲骨文中卽很多，周代且以之列爲貴族爵位，自然也無非薄之意，後世稱「男兒」，多少也有點自負的意思。若民果爲農之同稱，民之地位也不低了。商人的地位，在士大夫眼中固然不高，在秦漢時甚至與贅壻並稱，但因爲能發財，也常常爬起來，爲人所妬羨，西漢民謠有：「力田不如經商，刺繡又不如倚市門」。以農比繡，以商比娼，活畫出西漢社會對商人又鄙視又羨慕的神氣。所以商的階級雖然「顯著」，其地位却也不一定比農更高，比泛稱的民更高。

倒是現在，農民的地位眞是已降到最低，其原因是第一大多是不識字的文盲，這一點非常明白，不必多說。第二是農民穿短衣，不穿長袍。這一點看似無關，却是貧賤的顯著特徵。近代通例，穿長袍（西裝、中山裝同）是老爺，短衣是聽差，商人也識字穿長衣，縱非

老爺，也是先生。工人工匠則稱師父。而既不識字，又穿短衣的農民，則一般社會始終找不出一個適當的名詞來稱呼他。而他却對非其階級的人要叫老爺、先生或師父，他如果與城裏人在一起，則城裏人是上等人，他是底下人。

所以現在中國的農人，我覺得是在民與奴之間的一個階級，還夠不上古代的「横目之民」，只要看被抽壯丁時情形，其可憐決不在奴之下。現在中國如果要分階級，只有兩種：城裏人與鄉下人，亦即上等人與底下人。現在談民主的，民字含義是公民。公民又從英文Citizen一字譯來，而此字之原文原意依然是「城裏人」，與鄉下人固無關也。而事實上今之談民主者，也始終未曾也不想下鄉。「沒有這種基本認識的民主議論是迂闊不經的。」我完全同意潘先生的結論。

上文拉雜寫來，其論據雖有若干點與潘先生文稍有不同。不意亦能達到同一結論。我相信此文和他的整篇大旨，不是相反而是相成的。至於軍的地位及其與農之關係，他已經說得很詳細，不再說了。此文如有錯誤處，仍盼他能指正。